

中國農村經濟常識

中國農村經濟常識

• 每冊實價 國幣 角五分 •
五

著 者 薛 暮 橋

出 版 者 新 知 書 店

桂林 • 重慶 • 上海 • 昆明 • 貴陽
衡陽 • 宜山 • 辰谿 • 金華 • 麗水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卅一日初版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三版

作者自序

記得有人說過，農業經濟學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學。這話雖然過於誇張；但是農村經濟的研究，對於認識中國經濟問題，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在中國，研究農村經濟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較可靠的農村經濟讀物——尤其是農村經濟的通俗讀物——依然還很缺乏。三四年來，我們常想彙集過去讀書和農村調查所得到的知識，用集團的力量來寫本中國農村經濟書籍；然而終受環境限制，這個計劃到今不能實現。

前年十月中國農村月刊出版，作者試寫農村經濟的基本知識，每期登載一篇；這種有系統的敘述頗受讀者歡迎。可惜又因其種原因，寫了一半只得暫時擱筆。按照作者預定計劃，前半部寫農村經濟的一般理論，下半部寫中國的農村經濟，後面這一部份，直到今年一月中國農村二卷一期出版，方才能夠開始來同讀者見面。現在全部登載完畢，把它酌加補充，集成這樣一個小冊。作者本來想把上半部的一般理論合在一起發表；但因中國農村月刊第二卷起通俗化了，前後兩部份的敘述方法頗多歧異；所以決定

把它分爲兩冊出版

本冊共有一十四章；其中十一章在中國農村月刊上面按期發表，第六第十第十四章是後來補充進去的。第三章的末一節已經改寫，其它各章也有若干補充。作者因爲編輯工作過於繁重，所以這本小冊，雖然前後寫了一年，但是自己覺得有些地方還是不免草率。本來想在全部脫稿以後，再加一次詳細修改；不幸今年秋天突患肺炎，到今沒有恢復健康；同時新知書店却因本書稍有時間性的關係，急欲付印。因此只得就精力所及，稍加補充，這是一件很苦痛的事情，想來讀者是會原諒我的。

本書各章大多因受篇幅限制，理論方面既不能夠充分發揮，許多寶貴材料也不能夠盡量利用。車社先生曾在生活教育指出本書各篇文章的最大缺點，便是過於簡略，使讀者看得異常費力；這是實在情形。不過爲着適合中國農村月刊的編輯計劃起見，這也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作者自稱，關於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最重要的方法和材料，本書都已說到一點。讀者假使能夠細心閱讀，甚至一讀再讀，上述缺點或者可以得到部份的補救。假使這書能夠幫助各地鄉村工作青年，使他們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問題時候得到若干便利，那便是作者的幸運了。

中國農村經濟史綱要 第三卷

(82)	第一卷
(83)	第二卷
(84)	第三卷
(85)	第四卷

中國農村經濟史綱要 第四卷

(72)	第一卷
(83)	第二卷
(11)	第三卷

目 錄

序

第一章 中國農村中的基本問題

(71)	第一節 農村為什麼會破產	(1)
(81)	第二節 怎樣發生農村問題	(4)
(82)	第三節 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	(7)

第二章 帝國主義和中國農村

(75)	第一節 兩種錯誤的研究方法	(13)
(88)	第二節 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農村經濟	(16)
(10)	第三節 帝國主義怎樣剝削中國的農村	(19)

第三章 中國農村中的土地問題

- 第一節 怎樣研究土地問題……………(23)
- 第二節 土地的分配……………(25)
- 第三節 土地的使用……………(28)
- 第四節 土地關係的動向……………(31)

✓第四章 中國農業中的租佃關係

- 第一節 中國租佃關係的特質……………(35)
- 第二節 流行着的幾種租佃制度……………(38)
- 第三節 地租的形態和數量……………(41)

✓第五章 中國農業中的僱傭勞動

- 第一節 中國農業勞動的分析……………(45)
- 第二節 流行着的幾種勞動方式……………(48)
- 第三節 工資的形態和數量……………(52)

第六章 耕畜農具和農業資金

- 第一節 耕畜的分配……………(57)
- 第二節 農具和農業機械……………(60)
- 第三節 農業資金的分析……………(64)

✓第七章 中國現階段的農業經營

- (211) 第一節 怎樣研究農業經營問題.....(69)
- (011) 第二節 現階段的地主經濟.....(72)
- (521) 第三節 現階段的農民經濟.....(75)

✓第八章 農產商品化和農村市場

- (721) 第一節 中國農產商品化的特質.....(81)
- (121) 第二節 商業資本的剝削方式.....(84)
- (421) 第三節 農村市場和農產物的交換.....(87)

✓第九章 中國農村中的高利貸

- (621) 第一節 高利貸的社會性質.....(91)
- (921) 第二節 流行着的幾種借貸制度.....(94)
- (321) 第三節 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98)

✓第十章 中國農村中的田賦和稅捐

- (821) 第一節 田賦的繁重.....(103)
- (721) 第二節 稅捐的苛雜.....(107)
- (021) 第三節 田賦稅捐的徵收制度.....(109)

✓ 第十一講 農村副業和農民離村

第一節 鄉村手工業的分析……………(115)

(99) 第二節 農村勞動力的過剩……………(119)

(87) 第三節 農民的離村……………(122)

✓ 第十二章 中國農村經濟的新趨勢

第一節 農村經濟的總崩潰……………(127)

(18) 第二節 銀行資本的輸入農村……………(131)

(12) 第三節 中國農村的殖民地化……………(134)

第十三章 農村合作運動和農產統制

第一節 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特質……………(139)

(10) 第二節 農村合作組織的分析……………(142)

(10) 第三節 農產統制的實際意義……………(146)

第十四章 知識份子的鄉村改良運動

第一節 鄉村改良運動的來源……………(151)

(80) 第二節 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153)

(70) 第三節 定縣的平教實驗運動……………(157)

(60) 第四節 鄉村工作的出路……………(160)

最近三四年來，中國各地農村中間鬧得七零八亂；真所謂『十村九困，十家九窮』。於是大家叫着：『中國農村經濟完全破產了呀！』這話自然說得異常動聽。然而，假使我們追問一句：中國的農村爲什麼會破產？這却有點『茫茫然』了。

第一章 中國農村中的基本問題

最近三四年來，中國各地農村中間鬧得七零八亂；真所謂『十村九困，十家九窮』。於是大家叫着：『中國農村經濟完全破產了呀！』這話自然說得異常動聽。然而，假使我們追問一句：中國的農村爲什麼會破產？這却有點『茫茫然』了。

最近三四年來，中國各地農村中間鬧得七零八亂；真所謂『十村九困，十家九窮』。於是大家叫着：『中國農村經濟完全破產了呀！』這話自然說得異常動聽。然而，假使我們追問一句：中國的農村爲什麼會破產？這却有點『茫茫然』了。

第一節 農村爲什麼會破產？

最近三四年來，中國各地農村中間鬧得七零八亂；真所謂『十村九困，十家九窮』。於是大家叫着：『中國農村經濟完全破產了呀！』這話自然說得異常動聽。然而，假使我們追問一句：中國的農村爲什麼會破產？這却有點『茫茫然』了。

許多『學成歸國』的教授們說：這是因爲人口過剩，或者因爲生產落後。所以解決的辦法，不是讓這些『該死的』農民去受天然淘汰，就是發展生產。關於前一辦法，說來似乎有點不大中聽。這倒不是因爲教授先生們還沒有肅清『惻隱之心』，而是因爲地主資本家們恐怕農民死光以後，他們的地租和利潤便會沒有着落。所以，最妥當的辦法，還是發展生產。

然而另一問題卻又跟着來了。生產怎樣能夠發展起來？這個問題自然格外來得麻煩。有人以爲應當去學美國或

是英國的資本主義經營，有人以為應當去學蘇聯的集體農場。然而儘管教授們在講堂裏面怎樣講得『天花亂墜』，這對中國農民還是絲毫沒有影響。爲什麼呢？因爲無論英美式或者蘇聯式的農業經營，都須具備若干基本條件。這些基本條件如果沒有具備，單從表面上去模倣，決不會有絲毫結果。

那末所謂基礎條件究竟是什麼呢？先談英美式的資本主義經營：它的基本條件在消極方面，是要肅清各種封建束縛，使資本家能很自由很便宜地賣得或者租得巨大土地，大規模地經營農業。在積極方面，都市工業要向資本主義路上迅速發展；都市中的資本家和勞動者們需要大批原料，大批糧食，保證農業資本家能獲得豐富的利潤。

再說蘇聯的集體農場：它的基本條件在消極方面是要肅清農村中各種剝削關係（不論它是封建的或者資本主義的），保證農民大眾不受地主富農們的剝削；因爲農村中間沒有階級矛盾，所以農民大眾能夠站在平等地位上面，自由自在地組織起來。在積極方面，社會主義要在都市經濟中間佔有支配地位；這種社會主義都市非但不會剝削農村，而且會把大批最新式的農業機械供給農村，幫助農民大眾向着社會主義經營——集體農場發展。

現在來看中國的罷！中國雖然早已沒有典型的封建制

度，可是半封建的土地關係——一方面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一方面是半封建的饑餓佃農——仍在那裏束縛農業生產，使它不能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這就是說：地主因為可以徵收高額田租；他們再不願意自己經營，寧可把他們的田地租給農民。富農也因田租太高，不願多租田地，從事大規模經營，有時他們反而出租一部份田地。只有貧農除掉種田以外沒有別的出路，他們只有抱着小塊田地，利用陳舊的方法（因為他們沒有本錢採用改良方法）來經營農業。

另一方面，中國的都市工業（其實農業也是這樣）受了帝國主義的束縛，不能迅速發展；因此農產物的需要，也就受了相當的限制。更不幸的是中國的農產市場受着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的操縱，它們可以隨便抑低價格；因此農業生產非但不能夠獲得豐富的利潤，甚至還要虧本！誰都知道，賺錢是資本家的唯一目的。中國的農業生產既然不能賺錢，還有那一個資本家願意把他們的資本，大着胆子放到農業上面去呢？這就是中國不能夠學美國英國的最根本的原因。

至於模倣蘇聯的集體農場，那是差得更遠！爲什麼呢？因為中國農村中間一方面有地主和富農，一方面有貧農和雇農，他們的利害關係往往互相衝突。貧農和雇農靠着

幾隻空手，固然沒有方法憑空捏出一個集體農場；地主和富農又是有田有地，有錢有勢，誰都不願意同那些窮光蛋去攪在一起。並且組織集體農場的最後目的，是要消滅剝削制度；專靠剝削過活的地主富農，以至帝國主義者和都市資產階級，他們怎樣能夠眼睜睜地看着人家來掘他們的命根子呢？

那末，中國的農村破產已經沒有方法挽救了麼？決不是的！上面許多說話告訴我們：中國農村破產的根本原因，不是生產落後，而是阻礙農業生產發展的各種社會關係。假使我們能夠打破這些阻礙，一切問題都是容易解決的啊。

第二節 怎樣發生農村問題？

一百年前，中國農村中的生產比較現在還要落後；不過農村問題却是並沒有像這樣嚴重。碰到太平盛世，許多田園詩人（自然他們大多不是農民，而是封建地主）還能搖着鵝毛扇子唱唱『歸去來兮』，回到農村中去找他們的理想世界。雖然那時候的農民，一般也是受着嚴重的封建剝削；不過他們靠着『男耕女織』，還能夠『含辛茹苦』地過他們的安定生活。然而，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時勢也就變了！

記得有人說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就是都市剝

削農村」；這話說得有點道理。爲什麼呢？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般說來，總是工業先於農業，都市先於農村。農村因爲生產落後，所以它就不得不受它的老大哥——都市——的支配，不得不受它的老大哥的剝削。

不過，都市中的資本主義工業如果能夠順利發展，那就不一定會發生農村問題。因爲在這時候，農村中的手工業雖然破產，許多農夫農婦雖然不能夠在農村中找到出路；但是他們可以跑到都市中去，去受新興資本家的僱傭。他們領得工錢以後，只要省吃儉用，還能積下一部份來，帶回農村中去，使他們的家庭不致於會迅速破產。

都市工業的發展更進一步，又會刺激農業，使它也向資本主義發展。爲什麼呢？因爲都市工業發展以後，需要許多原料，需要許多糧食。都市裏面這時自然已經不能種棉種麥；這些東西完全要靠農村供給。另一方面，都市工業順利發展時候，資本很快累積起來；只要農業能夠獲得豐富的利潤，一部份的資本就會流到農村中去。而且新興工業還能夠供給改良農具，供給化學肥料。在這時候，農業自然也就向着資本主義順利發展；這種發展又可以吸收一部份的破產農民。

可是我們中國怎麼樣呢？中國農村的衰落，它的主要原因，是否也是都市工業的向着資本主義順利發展？並不

是的。誰都知道，打破中國農村中間「自給自足」範圍的主要動力，不是國內的新興工業，而是帝國主義，和依附帝國主義的新興買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面打破中國農村中的自然經濟——自給自足生產，破壞農村中的各種副業；一面又用種種不平等條約來束縛都市工業，束縛整個國民經濟，使它不能夠向着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自由進行。這就是中國農村問題——也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問題——的最主要的根源。

還有一層，農村比較都市格外吃虧。前面不是說過，資本主義發展中間，農業總是比較工業來得落後嗎？為什麼會發生如此現象？是否真如許多教授博士所說：農業本身不適宜於資本主義生產呢？這種說法表面看來也有一點理由；但是根本原因却是不在這裏。歷史告訴我們，農村是封建勢力的大本營；封建地主靠着他們佔有土地這件事情，總想束縛農民，強迫農民永遠做他們的奴隸。這種封建地主大多反對革命，希望永遠過着祖先傳下來的安富尊榮生活。因此這些封建餘孽假使不能肅清；那末農業的落後也就成爲免不掉的事情。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農村以後，封建勢力受了一個嚴重打擊。可是帝國主義者的目的是在攫取利潤；他們並不是來解放中國農民，也不是來改良中國農業。所以他們對於

帝國主義

這些封建餘孽，都是『皇恩浩大』。他們非但沒有肅清封建餘孽，而且多少還在那裏利用他們，通過他們而來剝削中國農民。這樣中國的農民自然更加苦了；因為他們要受兩個主子剝削。假使大主子（帝國主義）把手指向小主子（封建餘孽）一點，那末小主子就會對農民猛擊一拳；假使大主子把腳尖向小主子一蹴，那末小主子就會向農民猛踢一脚。你想！中國的農村怎麼不會破產呢？

也有人說：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簡單說來，是在舊的東西死得太快，新的東西長得太慢；因此弄得『青黃不接』。表面看來，這話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他們還只看到一面。據我想來，應當補說一句：這是因為應當長的東西不能長足，應當死的東西沒有死絕。假使新的東西能夠長足；那末舊的東西一定死得更加乾脆。反過來說：假使舊的東西果真死絕，那末新的東西一定長得格外順利。爲什麼會這樣拖泥帶水？最主要的原因，還在受了帝國主義的束縛！

第三節 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

現在我們可以總說一句：目前中國農村中間最基本的問題，第一就是民族解放問題，第二就是土地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怎樣打破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束縛，和怎樣肅清

甘
其
本
題
向

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它對中國的農村經濟究竟起了什麼影響？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在積極方面：第一，它摧毀了中國農村中的自然經濟體系，促成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更進一步發展農業本身中的商品生產。第二，它使中國的農業生產直接間接依賴着世界市場，這樣它就能夠通過了複雜的市場體系，而來控制中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

『在消極方面：第一，由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受了障礙，因而一般地削弱了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發展中的必要條件——例如能夠獲得豐富利潤的農產價格，資本和進步技術的供給等等。第二，帝國主義對於農村勞動大眾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榨取，阻礙了農業資本的蓄積；這使農業生產一般不能擴大，甚至於連原有的生產規模都很難維持。第三，帝國主義者的勾結殘餘封建勢力，利用它來榨取中國農村勞動大眾，會使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發展更為困難！』(註一)

總說：帝國主義一面擴大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以及它的附庸——買辦資本)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支配作用；一面又阻遏着農業生產本身的向資本主義道路自由發展。

(註一)中國農村第一卷第十二期：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答

發展！

其次，說到肅清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肅清殘餘封建勢力，爲什麼先要解決土地問題呢？我們可引閻錫山先生的一句說話來做答覆。他說：『今日經濟侵略下之農村，無田之耕農，歉歲所分之糧少，不足以供食用；豐年所分之糧賤，不足以易所需。而藉租息生活者不勞而獲，反比一般貧農無論豐年歉歲生活爲優。土地私有實爲枷鎖！』這就是說：地主佔有土地，這是殘餘封建勢力束縛農民們的最有力的一個『枷鎖』；這重『枷鎖』如果不能打破，農民們是不會獲得解放的啊！

土地問題所以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不但因爲地主利用土地私有權來剝削無地農民；而且因爲『這種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同時又是高利貸者和封建性的農村商人們的地盤；因爲無論是不自由的農奴，或是『自由』的無產階級，都沒有像這種半自由半獨立的貧農那樣容易受他們的宰割。』(註二)自然，這種一年中間倒有半年以上常被饑餓威脅着的貧農，他們時常要去懇求地主，債主，商人。同時他們自己多少還有一點田地可供典押，或者多少還有一點農產可供抵償；地主，債主，商人自然也就很願意『趁火打劫』地去『救濟』他們！

(註二)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五期：中國農業生產關係底檢討

所以，中國的農業生產要想自由發展，最少限度必須打破這樣兩重束縛——帝國主義和殘餘封建勢力。這兩重束縛是互相聯繫着的，決不能夠單獨獲得解決。上面說過，中國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地主豪紳，一是由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維持着的。爲什麼呢？因爲殘餘封建勢力的肅清，要以資本主義（或者更進步的社會主義）生產的自由發展爲其前提。帝國主義既然不能容許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自由發展，自然也就有意無意地做了殘餘封建勢力的保障。所以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結果也就不能肅清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

反過來說：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地主豪紳——又可說是帝國主義支配中國農業生產和剝削農村勞動大衆的工具。他們是農村勞動大衆最直接的統治者；農村勞動大衆的血汗，通過了他們（和都市中的買辦資產階級）而滾滾外流，去填帝國主義者的慾壑。所以忽視農村內部的矛盾，維持着地主豪紳的統治，也就沒有力量來推翻帝國主義勢力，完成勞動大衆的解放工作。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農村勞動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工作，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域，都不能有輕重先後之分。在實踐上，這種輕重先後之分，有時候是可能而且十分必要的。譬如在民族危機最嚴重的今日，爲着「精誠團結

，共赴國難」起見，便應當避免農村內部的許多不必要的衝突。不過這也並不是說，在集中力量解救民族危機的時候，可以不要減輕各種封建性的剝削。假使這樣，我們就把農村勞動大眾排除到抗敵救亡運動以外，因而也就把民族自衛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答余霖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新知書店出版）

原书空白页

第二章 帝國主義和中國農村

第一節 兩種錯誤的研究方法

前章已經說過，現今中國農村中的基本問題，第一就是怎樣抗拒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第二就是怎樣消滅農村中的各種封建束縛——尤其是怎樣解決土地問題。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帝國主義怎樣侵略中國農村。

從來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人，他們往往犯着兩種錯誤：第一種人專從農村中去解決農村問題，他們並不瞭解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已受都市支配；而且整個國民經濟又在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之下。第二種人以爲中國農村中間只有一個帝國主義問題；他們完全忽視農村內部的矛盾；也不願意去問帝國主義者如何通過這種內部矛盾，而來剝削農村中的勞動大眾。總而言之，這兩種人都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

中國的農村經濟究竟爲什麼會破產？第一種人以爲這是由於『封建剝削』；說得明白一點，就是由於地主的壟斷

土地，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商人的不等價的交換，以及苛捐雜稅，攤派勒索等等。表面看來，這話說得很有道理；然而細細一想，却還大有問題。

在中國，上面所說各種『封建剝削』，至少已有二千多年歷史。過去雖然也曾發生許多次的農村破產以至農民暴動；然而那時候的農村破產，是現階段的農村破產截然不同。現階段的中國農村問題，顯然並不單純地從農村內部發生；促成這種農村問題的主要動力，乃是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現今中國農村中的地主豪紳正在逐漸失掉獨立作用；他們大多直接間接受着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並替帝國主義盡着『吸血管』的作用。所以，假使我們忽視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專就農村中來解決農村問題，一定把握不到問題的關鍵。

第二種人以為現階段的中國農村問題，只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問題。他們以為帝國主義者的資本勢力，已經直接支配着中國的農業生產；就有殘餘封建勢力存在，也已變成帝國主義者的『夥計』；不值得去注意他們。這種說法雖然糾正了第一種人的錯誤；但是他們却又跑到了另一個錯誤的極端去了。

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在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之下，這點誰都不會否認。不過，帝國主義者究竟怎樣支配着中國的農

村經濟？他們還是根本改變了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用資本家對工資勞動者的方式來剝削農村中的勞動大眾；還是維持着半封建的生產方式，透過了殘餘的封建勢力，而來達到他們剝削農村勞動大眾的目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仔細研究，否則我們不會正確瞭解中國農村問題的性質，以及解決農村問題所應當採取的途徑。

一般說來，帝國主義者的支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農村經濟，可以採取着兩種不同的方式：第一種是掠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土地，經營大規模的農場；並用政治的經濟的力量，強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衆到他們的農場上去工作。這種僱傭勞動往往帶着極濃厚的強迫性質；他們爲着納稅，爲着還債，爲着缺乏土地，不得不去做這半奴隸的苦役。非洲和南洋羣島的棉花，樹膠等類經營，大多採取着這種方式。

第二種是維持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小農經營；他們——帝國主義者——運用着巨大的經濟勢力，壟斷農產市場，從事不等價的交換，這樣來剝削農村中的勞動大眾。這時都市中的買辦資產階級，和農村中的地主豪紳，便成爲帝國主義者和農村勞動大眾中間的橋樑。他們盡力壓榨農村勞動大眾，把他們——農村勞動大眾——的血汗吸到都市中來，去填帝國主義者的慾壑。

第一種方式大多用在比較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那裏農業還極幼稚，奴隸或者更原始的公社制度佔着相當的優勢。第二種方式大多用在比較進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那裏農業已很發達，封建或者農奴制度佔着相當的優勢。在中國，帝國主義者支配農村經濟的方式，無疑地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第二節 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農村經濟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的農村經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關於這個問題，也有幾種不同的解答。一部分人以爲帝國主義只是通過了殘餘的封建勢力而來實行間接剝削，他們對於農村生產關係並未引起任何顯著的變化。這種說法也有一部份是對的。譬如，軍閥官僚們向農民征收苛捐雜稅，去償付帝國主義者的賠款和借款，這是一種間接剝削；不過，這並不是帝國主義者剝削中國農民的主要方式。

一般說來，帝國主義剝削中國農民的最主要的方式，是不等價的交換；換句話說，是用購買原料和推銷商品這種方式。因爲這樣，他們必須打破農村中的自給自足經濟組織。首先他們破壞農村中的手藝工業；用舶來商品或都市中的資本主義工業，去代替農村中的手工生產。於是農

民們的一部份的生活資料要靠市場供給；爲要購買這些生活資料，就非出賣一部份的農產不可。

更進一步，他們又使農業本身趨向商品生產，而且爲使自己能夠獲得廉價原料，必須進而壟斷農產市場。例如東北的大豆，華北各省的棉花，山東安徽河南等省的烟草，幾乎已經完全落入帝國主義者的掌握之中。另一方面，糧食雖然不是主要出口物品；可是因爲洋米洋麥的傾銷，所以就連糧食價格也要受他們的操縱。近幾年來所謂『殺賤傷農』，無疑地是帝國主義操縱中國農產市場所引起的結果。

另外一部分人以爲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的農業生產已經向着資本主義道路自由發展；這是過份誇大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進步作用。帝國主義雖然引起了中國農村中的商品生產，使中國的農業生產通過了市場而受資本的支配，中國的農村勞動大眾通過了市場而受資本的剝削；可是他們的作用也只到此爲止。希望他們更進一步，去建立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關係——大規模的雇工經營——這是一個奢望。

本來，商品生產如果普遍發展，必然就會跟着產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中國農村中間，這種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已經略具萌芽；不過它却不能自由發展。因爲第一

前次已經說過，農業的向資本主義發展，要以都市工業的向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為其前提。可是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都市工業的發展，受着帝國主義者的政治和經濟勢力的束縛。近幾年來，農村資金雖然向着都市迅速集中；但是這種集中着的資金，大多用在地產公債等類投機事業，許多民族工業反而缺乏資金，無法維持。這是都市工業不易發展的一個明證。

第二，中國的農業生產已經通過了市場而受帝國主義者的支配；尤其是棉花煙草等類最易向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商品作物。帝國主義者為要獲得超額利潤，盡可能地抑低農產價格；甚至利用高利貸的方式來實行最殘酷的剝削。因此地主富農既然覺得農業無利可圖，甯可把他們的資金送到都市中去，或在鄉村中間購買土地，經營高利貸和商業；不願意向農業投資。至於大多數的中農和貧農，他們一年一年陷入貧困的深淵之中，根本沒有力量來改進生產，發展農業。

第三，前次已經說過，帝國主義者非但沒有肅清中國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而且還在有意無意地去扶助農村中的許多商人和高利貸者，以及一般地主豪紳。至於更上層的軍閥官僚，主要也在帝國主義者的卵翼之下殘留下來。這一整個系列，只會摧毀農業，加速農村破產；他們再

不會來建立什麼較進步的農業生產方式。

這樣看來，中國的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之下，雖然逐漸趨向商品生產；但是農業生產方式本身的改進，却仍受着極重大的障礙。在這現狀之下，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固然不能自由發展，至於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更是一個烏託邦的幻想。中國的農村經濟所以發生嚴重問題，主要原因就在這裏。假使農村經濟果真能在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之下自由發展，那末根本也就沒有什麼農村問題。所以，主張帝國主義能夠幫助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學者先生，他們非但曲解了現階段的中國農村問題；而且已把農村問題根本取消了啊！

第三節 帝國主義怎樣剝削中國農村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分析帝國主義者的剝削中國農村勞動大眾，究竟採取着怎樣的方式。這裏我們可以首先舉出上面所說超經濟的間接剝削，這就是利用賠款借款（這種借款主要用來鼓動內戰，撲滅革命，並非用於生產事業）這種方式，來吮吸農村勞動大眾的膏血。關於賠款，單單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兩項，合計已達六萬八千萬兩；還了四十年仍沒有還清。至於借款數額，更是年年增加；目下每月就要償付外債本息二千萬元以上。這種巨大支出，自

然一大部份來自農村；中國農民所負擔的苛捐雜稅所以無法減輕，這無疑地是一個重大原因。

然而，這還不是帝國主義剝削中國農村勞動大眾的最主要的方式；他們最主要的剝削方式還是經濟剝削。中國總算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除掉淪亡四年的東北四省，和正在淪亡中的華北各地以外，帝國主義者還不能直接支配中國農村中的勞動大眾。因此他們實行經濟剝削，一般還是必須通過都市中的買辦資產階級，以及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租界上的外商銀行和洋行，便是他們侵略中國農村的大本營；在這下面有買辦性的華商銀行和錢莊，以及各種商業機關；再下面是農村中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他們直接支配着農村勞動大眾的經濟生活。

他們——帝國主義者——利用這個經濟侵略體系，一方面收買原料，一方面推銷商品。在他們收買原料的時候，自然利用壟斷地位，盡量抑低農產價格。同時，農村商人以至買辦爲要獲得超額利潤，常常採用『賒肥料』，『買青苗』等高利貸的方式；這種高利貸資本往往是受帝國主義者的代理機關——銀行和錢莊的供給。另一方面，在他們推銷商品的時候，一面破壞了農村中的手工生產，引起多數農村勞動者的部份失業；一面又提高了地主豪紳們的生活程度，這使他們不得不向農村勞動大眾加緊剝削。

可是這種間接剝削究竟不能滿足帝國主義者的要求；他們需要建立一種更直接的剝削方式。在許多商品作物區域，這種較直接的剝削方式已在那裏逐漸建立起來。例如英美烟公司在山東收買菸葉，他們壟斷一切，直接掌握着鄰近千萬種菸農民的經濟命脈；同時還有中國的銀行和軍警，常駐在公司裏面去替他們服役；而英美烟公司的買辦，也就變成膠濟一帶一個最有勢力的人物。

冀魯兩省的棉花生產，也已多半落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掌握之中。在這裏，華商銀行所辦運銷合作組織，不知不覺地也變成了日商收買棉花的最新式的代理機關。日本帝國主義由於壟斷棉花，間接掌握着中國紡織業的命脈；中國紡織業者所用棉花，往往反而要靠日商供給。例如幣制改革以後棉紗漲價，可是許多華商紗廠却因缺乏棉花而被逼停工；這更是帝國主義壟斷農產所造成的嚴重結果。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北所採用的侵略方式，更比上述兩個來得毒辣。在這裏，他們公然實施統制經濟政策，用政治的力量來完成他們壟斷農產貿易的目的。例如日本資本控制下的滿洲棉花公司，就是東北棉花貿易的唯一的壟斷組織。他們非但對於棉麻等類商品作品實行統制，目下已經進而統制糧食貿易。事實告訴我們，東北淪亡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絲毫沒有改進東北的農業生產；只是利用這

種壟斷地位，盡力操縱農產價格。東北農民在這統制政策之下所受到的慘痛剝削，已經遠超過軍閥統治所造成的紀錄。

根據最近消息，日本資本正在『中日經濟提攜』這一口號之下，努力完成對於華北農產——尤其是棉花和羊毛——的統制政策。滿鐵控制下的『興中公司』已在天津成立；他們正在積極促成『工業日本』和『農業中國』這種根本計劃。這就是說：他們要使華北乃至整個中國變成專替日本種植廉價工業原料的一個園圃；他們要使中國農村勞動大眾的血汗，完全通過日本資本控制下的壟斷組織，化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超額利潤。這種政策一旦實現，那末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農村的方式，又會另換一付面目了吧。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財政資本與統治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統治方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
2. 從半殖民地到殖民地滿和法中國農村第三卷第一期

第三章 中國農村中的土地問題

第一節 怎樣研究土地問題

凡是關心中國農村問題的人，都會承認土地問題已經到了異常嚴重的程度。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說：『年來山西農村經濟整個破產；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農雇農。以至十村九困，十家九窮；土地集中之趨勢，漸次形成。在此情形之下，不但佃農雇農最易受共匪之煽惑；即自耕農半自耕農，鑒於自己之經濟地位日趨動搖，亦易受共匪之煽惑，共匪即以土地革命，為奪取農民心理之要訣。』從這幾句說話中間，就可看到中國農村勞動大眾的要求土地，如何引起統治階級的憂慮了！

然而，雖然誰都承認土地問題十分嚴重；可是怎樣瞭解土地問題，或是怎樣解決土地問題，那就各有各的巧妙。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博士教授以為土地問題只是一個『耕地不足』，或是『人口過剩』問題；所以解決辦法，不是『節制生育』，就是『移民墾殖』。可是一旦他們看到節制生育

既然緩不濟急，移民墾殖又是勞而無功時候；那就只得放着土地問題不談，掉轉頭去提倡『工業救國』。顯然，這只是取消土地問題，決不是解決土地問題。

中國現有耕地雖然不敷分配，可是荒地却在年年增加；就是繼續耕種着的土地，也因種種原因，經常陷於半荒半熟地位。說是沒有勞力吧，中國農村中間充滿着失業和半失業的勞動大眾；他們爲着生存，正向都市逃亡，或是等候『共匪』們的『煽惑』。說是沒有資金吧，每月常有五六百萬甚至一千多萬銀元正從內地流向上海；儘管農村中的資金如何枯竭，它們還在紛紛離開農村。爲什麼一面有大量的土地荒蕪着，一面又有大量的勞力，和大量的資金從農村中間排擠出來，得不到適當的配合？這當然是那些博士教授們所不能解答而且不願解答的問題。

較進步的學者，以爲土地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分配問題。他們承認中國農村中間大部份的土地，已經集中在少數地主富農們的手裏；所以他們站在平等思想上面，來替貧農雇農要求分配土地。當然，土地分配問題是現今中國土地問題的核心；但是僅僅研究土地分配，決不能夠全面地來把握現階段的土地問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地主和各類農民如何利用他們所有土地，以及各種租佃關係，各種勞動方式，最後闡明這種土地關係如何阻礙農業經營的合理

化——這樣我們才能認識現今中國土地問題的全貌。

任何經濟問題，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反映；這就是說，只有在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時候，才會產生各種經濟問題。所以，現今中國土地問題所以如此嚴重，不僅因為分配不均；最主要的還是這種土地關係妨礙農業生產力的自由發展。許多博士教授以為土地革命只能解決分配問題，不能解決生產問題；甚至會使農業生產愈益衰落。可是我們以為現今中國的農業生產所以如此衰落，現存土地關係也是一個基本原因。只有徹底解決土地問題（自然同時還要解決其他基本問題），方才能使農業生產迅速發展。所以我們研究土地問題的主要目的，就在駁斥各種錯誤理論，並替中國的農業生產計劃一條自由發展的平坦道路。

第二節 土地的分配

過去會有許多名流學者，利用東亞同文學會捏造着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土地所有權的如何分散。可是近幾年來，許多政府機關和學術機關所發表的調查報告，都已一致證明上述統計數字如何荒謬無稽。同時，各省農民的減租抗租風潮，尤其是從東南到西北的所謂『赤禍』，更從事實上來打擊這些名流學者幻想中的太平世界。過去二年，

土地委員會調查全國二十二省的土地分配情形，最近已把調查所得到的結果整理發表：

	戶 數	人 數	佔總面積
5畝以下	35.61%	23.64%	6.21%
5—9.9畝	23.99%	22.06%	11.42%
10—19.9畝	21.16%	22.43%	19.80%
20—29.9畝	8.22%	10.05%	13.17%
30—49.9畝	6.20%	8.67%	15.54%
50—99.9畝	3.33%	3.48%	15.54%
100畝以上	1.34%	2.49%	18.32%
合 計	100.00%	100.00%	100.00%

上表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情形；但是並未告訴我們多少土地已經落入地主們的手中。現在根據農村復興委員會等機關的陝西，河南，江蘇，浙江，廣東，廣西（一九三三年）六省調查報告，再來推算各類村戶土地分配的一般情形：

類 別	戶 數	所有耕地
地 主	3.5%	45.8%
富 農	6.4%	18.0%
中 農	19.6%	17.3%
貧農雇農	70.5%	18.4%

地主富農所有土地，非但在數量上遠過貧農雇農，就在質量上也比較貧農雇農來得優越。一般而論，華南的水田遠比華北的旱地來得肥沃；同時華南的土地所有，也比華北更爲集中。中央農業實驗所最近（一九三四年）所作農佃統計，很可指出這種顯著現象：

	自耕農	半自耕農	佃農
華北十省	63.7%	21.3%	19.0%
華南十一省	23.5%	29.0%	42.5%
全國平均	46.0%	20.0%	29.0%

在水田和旱地並存的地方，肥沃的水田也常首先落入地主富農們的手中；中農——尤其是貧農大多只有瘠瘠的旱地。廣東番禺兩個旱作村的調查（一九三三年）是個很好的例子：

	地主	富農	中農	貧農
水田	61.3%	63.0%	53.6%	37.3%
旱田	38.7%	37.0%	46.4%	62.7%

江蘇句容全縣的自田租田統計（一九三三年），也同上表完全一致：

	自耕田地	租佃田地
水田	63.27%	36.73%
旱地	36.70%	13.30%

上面許多統計都在那裏告訴我們，在中國農村中間，僅佔村戶總數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了最多和最好的土地；另一方面，佔村戶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貧農和雇農，他們因為沒有土地，或是所有土地太少，不得不去仰受地主富農們的苛重剝削。許多博士教授看到華北各省自耕農的較佔多數，以為這裏的土地問題並不怎樣嚴重。其實這些自耕農民大多也是異常缺乏土地，他們單靠田地上的收入決不足以維持生活。因此他們必須兼營苦力，小販，以至割草，拾糞等類副業；就在農忙時期，也須拋棄了自己的田地，去受地主富農們的僱傭。此外苛重的田賦，稅捐，攤派，徵役，又會重重疊疊地壓到他們的肩上。因此他們所受剝削，並不亞於華南各省的貧苦佃農；他們的生活只有比華南農民更加痛苦。所謂無憂無慮的飽暖生活，實際只是博士教授們的幻想而已。

第三節 土地的使用

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來看地主富農怎樣利用他們所佔有的廣大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原是商品經濟社會中的一般情形。但是，各國國家由於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各不相同，地主們的利用土地，也有種種方式。例如普魯士的地主大多僱傭工資勞動者來經營自己所有的廣大土地；

他們是資本主義的經營地主。英吉利的地主多把所有土地租給資本家去經營，他們是資本主義的收租地主。俄羅斯在革命以前，許多地主利用半強制的負債勞役來經營土地；這是半封建的經營地主。愛爾蘭的土地大多落入英國人的手裏，這種英國地主多把土地分割開來租給貧苦佃農耕種；這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

在中國農村中間，因為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不能自由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的經營地主和收租地主，都是異常稀少。在華北各省，許多中小地主往往留着一大部份土地自己經營；在華南各省，無論大小地主多把全部或是絕大部份土地出租。但就一般而論，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在全國地主中間佔着很大的優勢。根據過去所發表的許多調查報告推算起來，全國地主所有土地，大約只有百分之十留着自己經營，其它部份都是分割開來租給佃農耕種。他們對於農業生產的最大作用，只是吸收苛重佃租，使農業資金日益涸竭；農民生活日益困苦而已。

其次再看富農經營。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間，所謂富農大多是向地主租借廣大土地，僱傭工業勞動者來大規模地經營；他們實在就是農業資產階級。但是中國的富農，除掉極少數的例外，一般總是僱傭少數長工短工來經營他們自己所有土地。這種富農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自己

的勞力；他們並不去向地主租進廣大土地，有時甚至還把自己所有土地中的一小部份出租，這種富農多少帶着一點小地主的性質；尤其是在華南各省，富農這種特性更加來得顯著。關於這點，我們可引下列兩個統計，來做一個鮮明的對照：

帝俄塔利啓尼蒲洛夫縣統計

	使用土地	租進土地	租出土地
富農	46.4%	9.9%	9.2%
中農	41.2%	25.5%	25.5%
貧農	12.4%	6.6%	65.3%
總計	100.0%	100.0%	100.0%

一九二九年江蘇省無錫縣統計

	使用土地	租進土地	租出土地
富農	18.7%	9.2%	56.7%
中農	30.4%	21.5%	24.2%
貧農	51.9%	69.3%	10.1%
總計	100.0%	100.0%	100.0%

最後，貧農在中國的農民中間佔着極大部份；而這貧農階層，大多是由貧苦佃農（或半自耕農）組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間，貧農大多主要是靠工資收入維持生活；他們

是農村中的半無產者。在中國，貧農的出僱雖然也很普遍；但是因為地主經營和富農經營不很發達，他們很不容易找到出僱的機會。因此他們大多只能去向地主，富農租進幾畝田地，繳納苛重佃租；貧農這種特性，也在華南各省特別來得顯著。現在把番禺卜村的貧農分析（一九三三年）來做例子：

	自耕者	租種者	出僱者	總計
戶數	105戶	372戶	63戶	540戶
百分比	19.4%	68.9%	11.7%	100.0%

註：工資收入多於田間收入的是「出僱者」；其餘部份，租田於自田的是「租種者」；自田多於租田的是「自耕者」。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地主（甚至富農）大多是把所有土地分割開來租給貧苦佃農耕種；中國的貧農大多是向地主（或向富農）租地經營，他們所受到的最主要剝削乃是苛重佃租。這種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和半封建的飢餓佃農的對立，就是中國現存土地關係的特徵。

第四節 土地關係的動向

前面曾經說過，現今中國的土地問題所以如此嚴重，主要原因就在這種土地關係妨礙農業生產力的自由發展。爲什麼呢？因爲在這土地關係之下，地主富農既然不願擴

大經營，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一般貧農又因受了苛重剝削，再也沒有力量來改進農業。我們已經知道，這種半封建的小農經營要想向前發展，只有兩條道路可走：第一是地主富農經營自由發展，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第二是消滅地主富農，讓這些小農經營自由聯合起來，組織集體農場，跑上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村中間，這兩條路都是走不通的。

中國農村中間半封建的土地關係非但不見消滅，而且還在那裏一天天地鞏固起來。首先我們看到土地所有權的分配，這幾年來正在繼續集中。而且商品生產愈發展的地方，集中情形也就更加顯著。例如廣東番禺十代表村調查，告訴我們下列數字：

	1928年	1933年
自耕戶數	30.6%	29.6%
租種戶數	69.4%	70.4%
自耕田畝	29.8%	28.7%
佃種田畝	70.2%	71.3%

廣西省的蒼梧，桂林，思恩（蒼梧最前進，思恩最落後，桂林介於兩者之間）三縣自田租田比較，更可看出在商品經濟愈發展的地方，土地所有愈加集中，而且集中的趨勢愈加迅速：

	管樹	雜林	思恩
1929年 自耕	7.5%	80.9%	89.9%
租田	12.5%	19.1%	10.1%
1934年 自耕	33.6%	70.9%	89.0%
租田	66.4%	22.1%	1.0%

其次，關於土地使用情形，恰同上述現象相反，是在那裏愈益分散開來。這就是說，中國農村中的土地雖然正向地主富農手裏集中，但是地主富農經營並不因此發展起來，而且還在那裏日漸衰落。如在資本主義農業生產較發展的廣東番禺，富農經營在使用田畝方面本來已經佔了相對的優勢，但到近幾年間，這首席地位已被貧農經營所攫奪了。下面是番禺十代表村的各類農戶使用田畝統計：

	富農	中農	貧農
1923年	35.4%	30.2%	8.8%
1931年	33.9%	28.2%	37.9%

在江蘇無錫，小農經營向佔絕大優勢；近來這種現象還在繼續發展。現把無錫三村各類經營消長統計錄下：

	小經營	中經營	大經營
1922年	78.35%	16.09%	25.6%
1927年	41.50%	35.37%	23.1%
1932年	50.0%	31.3%	5.57%

註：小經營——十畝以下，中經營——十至廿畝，大經營——廿畝以上，這裏所謂中大經營是相對的。

上列許多統計數字已經充分證明，在中國農村中間，資本主義經營的發展，是件如何艱難困苦的事情。不過爲着充分明白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階段，及其前途起見，單單研究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情形是不夠的。下面我們還要進一步來研究租佃關係，農業勞動，以至耕畜農具等類生產資料的分配情形，然後綜合着來觀察中國現階段的農業經營的全貌。

本章重要參攷資料：

1. 中國土地問題的本質 趙霖僧 中國農村 (第三卷第六期)
2. 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 陳翰笙 中國農村經濟論 (黎明書局出版)
3. 現階段中國土地問題的研究 陶直夫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第一卷第二期)
4. 封建土地關係的資本主義化 薛暮橋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第三卷第四期)
5. 私有？村有？國有？ 孫冶方 中國鄉村建設批判 (新知書店出版)

第四章 中國農業中的租佃關係

第一節 中國租佃關係的特質

研究租佃關係的目的，是在更深刻地認識土地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的社會關係究竟怎樣？究竟是土地所有者同農業資本家的對立；還是地主同饑餓佃農的對立？他們所納地租，究竟是資本主義性的地租，還是封建性的地租？

許多博士教授也在研究租佃關係；可是他們研究租佃關係的主要目的，據說是要規定一個「公平租率」。據他們的研究，所謂「公平租率」，應當是佔地價的百分之八（中國地政學會），或佔產量的百分之三七·五（二五減租後

的租率）。他們似乎並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不願意承認——地租本身就從榨取勞動者的血汗得來，它是不公平的不勞而獲，只要地租存在，那就根本談不到「公平」兩字。所以這種紳士式的研究，除掉模糊問題，並替地主造一個理論根據之外，決不會有絲毫結果。

還有許多較進步的學者，他們研究租佃關係，僅僅是要說明地主如何殘酷地來剝削貧苦佃農。他們站在空洞的不等觀念上來反對苛重剝削；可是他們並不瞭解，租佃關係也同其它社會關係一樣，它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這就是說：任何租佃關係，都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間產生出來，它是整個社會經濟組織中的一個環節。離開了社會經濟組織的整個改造，租佃問題是不能夠單獨解決的。所以我們研究租佃關係，必須特別重視它同上述各方面的聯繫。

在封建社會中間，地主和佃農的租佃關係是固定的；非但終身不變，而且一代一代傳襲下去。所以這種租佃關係不是一種契約關係，而是一種身份關係。到了封建社會崩潰時候，身份關係破壞，契約關係跟着商品經濟而在那裏發展起來。不過在這時候，因為資本主義經營沒有發展，所以這時候的租佃關係，還是地主和饑餓佃農的不平等的對立；後者對於前者，多少還有一點隸屬性質。最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租佃關係表示着土地所有者和農業資本家的對立；他們站在平等地位，同來分割工資勞動者——農業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現今中國流行着的各種租佃制度，究竟屬於那一種呢？從法律方面說來，這種租佃制度已經帶着很濃厚的契約性質——這種租佃關係要在地主和佃農雙方同意時候纔能

成立，而且任何一方都有權變更這種租佃關係。但就實際而論，中國一般地主，除掉鄉村中的小地主外，大多不願隨便更換佃農；一般佃農自然更不願意輕易放棄很難租到手的這塊小小田地。所以十年廿年甚至兩三代的佃農，在中國各省都還相當普遍。這種佃農對於地主自然『必恭必敬』，多少帶着一點封建式的主奴關係。

很顯明的，這種佃農一般總是農村中間最貧苦的階層；他們很少僱工經營，一大部份還要出賣勞力。廣西二十二縣四十八村調查統計，指出純粹佃農有百分之九五是在貧農層中；這很可以代表全中國的一般情形：

	富農	中農	貧農
自耕農	12.2%	29.8%	58.0%
半自耕農	3.6%	23.6%	72.9%
佃農	0.1%	4.8%	85.1%

這樣看來，中國的租佃關係，到今還逗留在從封建關係到資本主義關係的過渡階段；中國大多數的借地農民，都是半封建的饑餓佃農。而且因為他們大多經常要去懇求地主和富農們的『救濟』（欠租借債等等），因此他們也同一般半自耕農一樣，往往兼做半封建的負債勞役。這就是中國租佃關係的特徵。

第二節 流行着的幾種租佃制度

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具體地來分析現今中國流行着的各種租佃制度。中國除掉察綏等省遊牧區域，盛行一種奴隸制度（註三）之外；在雲貴等省的僻遠農村中間，也還殘留着一種封建性的土司制度。（註四）土司儼然是個封建領主，他有種種超經濟的統治權力。不過這些情形究竟限於狹小區域，而且已在沒落過程之中。這裏所能敘述到的，只是幾種較普遍的租佃方式。

1. 永佃制 在東南各省，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現在還流行着一種永佃制度。永佃制度的特點，是把土地所有權分成兩個部份：一稱『田底』，一稱『田面』。地主佔有『田底』，他的權利是向佃農收租；佃農佔有田面，他的權利是永遠保持着土地的使用權。在盛行永佃制的地方，除佃戶欠租外，地主沒有權力撤佃。佔有田面權的永佃農民，如果不願耕種這塊田地，可以把他的田面出租或是出賣；地主通常也是無權干涉。在他出租田面以後，也可以向佃農徵收田租，稱爲『小租』；而他繳給地主的租則

（註三）參看中國農村描寫（新知書店）龐普守 蒙古社會的奴隸制度。

（註四）參看中國農村描寫 農錫瑞 廣西龍州的土官制度。

稱『大租』。田面價格通常都是低於田底；但在人口繁密，地權集中的地方，田面價格往往反而高於田底。在這場合，永佃農民所納田租，自然也要比較輕些。

2. 分益雇役制 在西北各省，例如山西、河南、陝西，流行着一種『二八分種』制度，或稱分益雇役制。這種佃農同永佃農民恰恰相反，他們非但沒有『田面』，而且連耕畜、農具、種子、肥料都由地主供給。所以他們介於佃農和雇農之間，也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僱傭勞動。田地上的收穫，地主分到八成，佃農分到二成，所以普通稱為『二八分種』；但是也有三七分的。地主所分到的八成，名義上是地租，實際包括着農業的成本和利潤；佃農所分到的二成，也可說是一種實物工資。因為他們多少帶着一點僱傭性質，所以這種租佃關係很不穩定，年年可以變更。

3. 分益制 分益制流行於全國各省，它的特點是把收穫中的一部分（普通是百分之五十）來做繳給地主的地租。分益制有三種不同的方式。第一種是一切農本全由地主供給，佃農僅出勞力；這就是上面所說的分益雇役制。第二種是地主供給一部份的農本；例如地主和佃農各出一半種子，一半肥料，收穫所得糧食、柴草等等，也是對半分拆；這是最典型的分益制度。第三種是一切農本全由佃農供給，收穫也是按成分拆；這同下面所要說的定額物租制

度，已經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4. 定額物租制 定額物租制是全國各省最流行的一種租佃制度；它同分益制度不同之點，除掉農本全由佃農負擔之外，就是地租數額是由佃業雙方預先議定（例如每畝繳納一石糙米，或是六斗小麥）不一定受收穫豐歉的影響。不過定額物租制普通也有硬租軟租兩種：硬租不論豐歉，都是不折不扣；軟租遇到荒年，可以協議酌量減少納租成數。後者比較前者更為普遍。

5. 錢租制 錢租制盛行於大城市的附近，集團地主和商品作物區域。這種錢租大多還是封建性的；除掉用貨幣繳納地租之外，它同定額物租制一般還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在大城市的附近，通常流行着一種『折租』制度；即地租仍按穀物計算，但把應繳穀物按照市價折成貨幣繳給地主；這是從物租到錢租的一種過渡方式。

6. 力租制 力租制是用勞力來抵償地租，這在中國已經很少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江蘇寶山流行着的所謂『脚塞』制度。（註五）『脚塞』（即佃農）每向地主租田一畝，每年要繳納二十五天到三十天的力租——即替地主工作二十五日或三十日。這種租佃方式也可稱為雇役制度。河南等省流行着的『送工』也是一種力租，它是佃農繳納物租以外

（註五）參看農村通訊（中華書局出版）顧憲民寶山縣的『脚色』 頁四

的額外負擔。中央農業實驗所把中國的租佃制度分爲分租、穀租、錢租三項；調查結果，分租佔百分之二八·一，穀租佔百分之五〇·七，錢租佔百分之二一·三。這也可以看出中國租佃制度分佈的一般情形。

第三節 地租的形態和數量

一般說來，力租和物租是封建社會的地租形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間，主要都是採用貨幣地租（地租的形態並不能夠完全用來決定地租的性質。在封建社會崩潰的時候，往往流行着一種封建的貨幣地租；同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間，間或也有資本主義的現物地租存在）。我們看了上述各種租佃制度，就可知道現物地租在中國仍然佔着絕大的優勢。根據上面所引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現物地租（包括穀租分租）要佔全部地租中的百分之八十；貨幣地租僅僅佔了百分之二十。從這數字上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現存租佃制度，它是包含着怎樣的社會性質。

中國現今流行着的貨幣地租，雖然大多還是帶着很濃厚的封建性質；但就一般而論，它比現物地租多少是要進歩一點。廣東番禺的資本主義借地經營比較來得發達，同時也是貨幣地租最近通行的地方。那裏的調查統計指出：

在商品作物區域，錢租遠比稻作區域來得普遍；同時，較進步的富農經營，錢租所佔比重也是大於中農貧農。在那些實行商品生產的富農經營中間，顯然已經存在着資本主義的貨幣地租；不過它在全國所佔比重，自然還是異常渺小。下面就是番禺地租形態的統計：

	四個稻作村	四個商品作物村	合計
納穀租的	52.1%	3.6%	39.2%
納錢租的	47.9%	96.4%	60.8%

註：番禺是盛行錢租的地方

	富農	中農	貧農	合計
納穀租的	16.9%	45.9%	50.7%	39.5%
納錢租的	83.1%	54.1%	49.3%	60.2%

註：上表係番禺十代表村統計

決定地租性質的更重要的標誌，就是地租的數量。一般說來，封建性的地租包括着全部份的剩餘價值；它所留給借地經營者(佃農)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相當於資本主義農業經營中的工資部份。資本主義性的地租，是剩餘價值中間除去利潤後的剩餘部份；這時候工資勞動者獲得工資，借地經營者(農業資本家)獲得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剩餘部份——地租。所以這兩種地租雖然合用着同一名稱，但是它們却各自包含着一種特殊的本質。

中國一般佃農所繳納的地租，究竟屬於那一種呢？據一般估計，中國佃農所繳納的地租，大概要佔全部產量的半數上下。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的統計，地租佔產量的成份約如下表：

		上等	中等	下等
分租	水田	51.5%	48.2%	44.9%
	旱地	47.8%	45.3%	43.7%
定租	水田	46.3%	46.1%	45.2%
	地旱	45.4%	44.6%	44.3%

這裏應當注意，在佃農所得到的部份中間，還包含着種子、肥料、農具、耕畜等類生產成本；如果把這些成本除去，剩下來的往往不夠維持他們一家老幼最低限度的生活。這就是說，這種地租非但包括着全部剩餘價值，甚至還要侵犯到相當於工資的部份。這更可以充分表示中國租佃關係的半封建性。

中國的佃農不僅負擔着苛重的地租；他們除掉地租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額外負擔。這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流行於全國各省的押租制度。所謂押租制度就是：佃農在租地耕種之前，先要繳納一筆款項，來做按期納租的保證。國民政府主計處調查三百五十九縣，結果有一百六十九縣通行押租制度，即佔百分之四七·一。跟着土地所

有權的集中，和失業農民的增加，押租制度正在那裏迅速擴張開來；同時押租的數額也在那裏逐漸高漲。有些地方無力繳納押租的貧苦佃農，竟把押租作為拖欠地主的債務，每年加納幾十斤的利穀；這更顯然增加了地租的重量。

在工商業極不發達的內地農村中間，一般農民除掉耕種田地以外，沒有其它出路。他們恐怕地主收回土地，更是百般順從；除掉按期納租以外，有時還要貢獻若干其它物品。例如湖南、廣西等省，佃農的額外貢品有田頭雞、田頭鴨、船頭米、船頭錢等項；分租佃農每逢地主下鄉『臨田分穀』時候，還要酒肉供奉。許多地方地主自己經營土地，他們強迫佃農每年提供幾天勞役；例如前面所說到的『送工』。地主人家每逢婚喪喜慶，佃農大多還要『自動』地去服役。不過這些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深情厚誼』，在商品經濟的激盪之下必然逐漸消滅；尤其在經過革命浪潮一度洗刷的地方，恩情關係的崩壞更加來得急速。

朽腐的封建桎梏，已經羈束不住憤怒着的中國農民；最近各省蔓延着的抗租風潮，就是農村勞動大眾對這苛重剝削的一個消極答覆！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中國地租的本質 陶直夫 中國農村經濟論
2. 中國各省的地租 陳正謨 (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五章 中國農業中的僱傭勞動

第一節 中國農業勞動的分析

直到現在，中國許多農村經濟學者，他們對於勞動問題的研究，往往比較忽視。他們以為中國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不是勞動問題；可是他們並不知道，勞動問題的研究，是認識農業生產方式，因而更深刻地認識土地問題的一個極重要的關鍵。

一般說來，勞動力的商品化，即工資勞動者的廣泛利用，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在農業中間，工資勞動者的利用，也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之一的必要條件。不過農業生產由於它的技術上的特性，尤其因為受着土地私有制度的束縛，所以農業勞動的構成，往往保存着下列幾種特點：第一，農業中間因為小經營的廣泛存在，所以家族勞動往往佔着很顯着的地位；甚至在數量方面壓倒僱傭勞動。第二，農業中間存在着許多季節工人，他們一面出賣勞力，一面自己經營農業；這就是農業中所特有

的半無產者。第三，農業中的許多僱傭工人，往往受着土地或債務的束縛，他們的出僱多少帶着一點強制性質；因而成爲半封建的雇役勞動。

在我們中國農村中間，因爲農業生產的一般的落後，上面所說幾種特點自然更加來得顯著。先從數量方面來說；中國農業中的僱傭工人——雇農——究竟在全體農民中間佔着怎樣大的比重呢？關於這點，直到現在還沒有比較正確的全國性的統計。過去武漢政府曾經估計中國的雇農，約佔全體農民中的百分之十。最近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通信調查，（註六）指出雇農（包括長工短工）對於農村人口所佔比重如下：

	調查處數	人口	雇農	百分比
長江流域	112	91,214	8,455	9.27
珠江流域	50	74,820	6,082	8.13
黃河流域	192	228,361	25,070	11.41
各省總計	354	394,395	41,607	10.29

僱傭勞動在全體農業勞動中間所佔地位，可用雇工和家工的比較，把它更正確地表示出來。可惜關於這點，就連地方性的統計也是異常缺乏。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調查無錫三個農村，所得結果如下：

（註六）這項調查是有很多缺點：參看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七期『書報述評』——（P.104—105）。

	平均每戶 使用畝數	家工工數 百分比	雇工工數 百分比
地主	13.37	57.5	40.5
富農	17.63	77.2	22.8
中農	9.05	91.4	8.6
貧農	8.17	96.8	3.2
合計	9.45	90.7	9.3

浙江大學農學院的嘉興調查，也有類似的統計。

	平均每戶 使用畝數	家族勞動 百分比	僱傭勞動 百分比
小經營	11.27	91.76	9.24
中經營	28.52	71.51	28.49
大經營	74.99	45.66	54.34
合計	19.08	80.06	19.94

嘉興的經營面積比較大，所以僱傭勞動也比較多；但是家族勞動仍佔百分之八十。在經營狹小的無錫，家工更佔了百分之九十。至於僱傭長工和僱傭短工的比較，我們可以引用廣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的十縣二十四村調查：

	戶數	百分比	經營田畝	百分比
僱傭長工	131	10.1	3234	24.3
僱傭短工	32	24.7	4515	34.0
純自耕	849	65.2	5552	41.7

註：長工包括年工，季工，月工。

上面許多統計告訴我們；中國農村中的雇農，只佔全體農民中的一小部份；在中國的農業中間，只有很少數的地主富農經營，方才使用多量的僱傭工人——在經營面積異常狹小的無錫，就連富農經營所使用的僱傭勞動，也還不到全體農業勞動的四分之一在經營面積比較大的華北，也因為旱地耕作所需人工比較少的緣故，僱傭勞動所佔比率不一定會大於嘉興，——這些地主，富農經營所佔耕地面積，根據許多調查推算起來，大概只佔全體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至於大多數的中農貧農經營，他們除在農忙時期間或僱些短工之外，可以說是完全依靠家族勞動。從這些數字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經營，它所佔的地位還是相當微弱的啊。

第二節 流行着的幾種勞動方式^(註七)

中國農業生產的落後，不僅表現在僱傭勞動的數量方面，而且表現在僱傭勞動的性質方面。中國農耕中間存在着各式各樣的勞動方式，從封建性的強役勞動，一直到典型的資本主義性的僱傭工人。這些勞動方式的發展階段，

(註七)本文二三兩節，主要採用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谷區農工僱傭

自然是同整個農業生產的發展階段互相適應着的。

首先我們來看封建的甚至奴隸的勞動方式；這在西南若干最落後的農村中間還是相當流行。例如廣西北部的勝縣，河池，南丹一帶，那裏奴隸勞動到今還是廣泛存在。奴隸的來源普通是有兩種：一種是從小買來的男孩，長大以後變成奴隸；另一種是忠實而年青的長工，同主人家裏的婢女結婚——這往往是許多年的無償勞動所得到的報酬——以後，同在主人家裏終身服役。奴隸結婚以後，有時可從主人那裏領到幾畝薄田，一間茅屋；過着較獨立的生活，但仍經常要到主人家裏去做各種無報酬的工作。這樣他們便從奴隸變成農奴。（註八）

比較農奴勞動進一步的，便是半封建的雇役勞動；這在全國尤其是華北各省異常普遍。這種雇役勞動普通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是農民因為缺乏土地，而去接受那種半強制的工作。例如江蘇寶山流行着的『脚寨』制度，和湖北棗陽流行着的『趕工』制度，都可放入這一類中；這種雇役農民所得到的勞動報酬便是使用土地。在地生經營較發展的地方，一般佃農到了農忙時期，大多被迫着去接受地主們的僱傭，他們得到比較少的工資，甚至毫無報酬。這是雇役勞動的一種更普遍的形式。

（註八）詳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二期廣西各地的農運勞動。

第二種是農民因為負債緣故，而去接受地主，富農們的強制性的僱傭。這種勞動方式的最落後的，便是童工們的當身制度；往往為了一二十塊錢的債務，工作五年十年以後，還要償還本銀方才能夠恢復自由。也有許多農民預付工資，約定工作幾年償還本利；這些雇農實際已可說是債奴。更普通的便是短期的預賣勞力；即在農曆年底去向地主富農借錢借穀，到了明年農忙時期做工償債；這在各地都很流行。自然，這種負債勞役所得到的工資，往往少於自由勞動；有些地方甚至僅僅抵償利息。如在廣西思恩，借洋一元，每月要還利息男工一天，或是女工兩天，直到償還本銀為止。

第三種是農民因為缺乏耕畜農具，而用人力去換畜力。如在廣西各地，地主富農把牛租給貧農使用，到了農忙時期，可叫貧農帶着牛來工作三四十日；只供飲食，不支工資。江蘇蕭縣許多沒有牛的貧農，往往去同富農締結契約，做他們的『幫手』；『幫手』可向富農借用耕牛，但須無代價地去替富農工作。在四川綿陽，沒有牛的農民，用三天人力去換一天牛力；這在其它各省也很流行。此外如流行於各省的所謂『帶地傭工』——小農帶着自己幾畝田地，去受地主富農的僱傭——也同上述幾種勞動方式多少有些類似之點。

最後便是資本主義的工資勞動；這種僱傭工人——包括長工短工——不受任何束縛，純粹根據「自由」契約去受地主，富農們的僱傭。這種勞動方式在全國各地——除掉少數最落後的農村（例如廣西西南各縣）之外——都已相當普遍；而表現得最顯著的，便是流行於全國各省的「遊行工人」。例如河南山東兩省貧農，雇農，在本地小麥收割以後，逐步向北去替河北等省農民割麥，甚至遠及關外。又如廣西的地主富農，在插秧和割稻時期，很多僱傭遠地來的遊行工人：插秧時期多僱遊行女工，收割時期多僱遊行男工。（註九）這種遊行工人同雇主之間並無任何身份關係，也不受着土地，債務等等束縛；他們常常三五成羣沿途求僱，或是千百個人聚在市場中間，等候雇主們的降臨。

如把全國各地比較起來，在西南各省——雲南貴州廣西存在着最落後的奴隸勞動；華北各省普遍流行着半封建的雇役制度；而在華南——尤其是東南各省，資本主義的自由勞動已經佔着相當的優勢。過去許多農村經濟學者，他們看到華北旱地區域的僱傭勞動者，比較華南水田區域——尤其是東南沿海各省——來得普遍；因此懷疑華北各省的農業生產，是否果真要比東南各省進步一點。然而假

（註九）詳見中國農村經濟調查會編農村通訊——中華書局出版——

使我們研究到了這些僱傭勞動者的性質問題時候，就會看出上述結論，只是很空虛的表面現象而已。

第三節 工資的形態和數量

中國農村中的僱傭勞動多少帶着一點封建意味，這從工資的形態和數量上面也能表示出來。農業由於技術上的特性，它是需要很多量的季節勞動；因此農業中的僱傭工人，一般可以分爲年工，季工，月工，日工等等。根據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調查，各省農業僱傭工人最高工資的平均數字計如下表：

	工資數額	每日平均工資
日工(供給飲食)每日	0.34元	0.34元
(不供飲食)每日	0.51元	0.51元
月工(供給飲食)每月	6.76元	0.23元
(不供飲食)每月	10.55元	0.35元
年工(供給飲食)每年	45.57元	0.13元

註：二十一年國府統計各省年工平均工資僅四一·七七元

日工和年工的每日平均工資收入所以相差很遠，第一由於上列日工工資乃是農忙時的工資，這時勞動異常緊張，而且受僱時期又很短促；不比年工包括農閒時間，生活又比日工較有保障。第二由於這些年工一般帶着很濃厚的

奴隸色彩；日工比較起來自由一點（因為上引數字全是最高工資，所以這種日工大多不是半封建的負債勞役）然而就連這種獲得最高工資的自由勞動，他們所得工資一般還是低於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例如民國十八年上海各業工人每日的平均工資計有七角一分，就連工資比較小的棉紗工業也有五角五分；這已高於農忙時的日工工資，比較年工資更要高出幾倍。從這對比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雇農如何過着比較城市工人更慘淡的生活。

農業僱傭工人的落後，並不到此為止。在中國農村中間，除掉貨幣工資之外，還存在着各式各樣的現物工資。首先來看穀物工資，這在各省都還相當流行。例如山東有種長工，是在農產中間抽出十分之一作為工資；河南山西等省流行着的『二八分租』，也可說是穀物工資的另一方式。穀物工資在短工中間更加流行：例如福建尤溪割稻一日給穀十斤作為工資。廣東從化農忙時期做工六十日，給穀二百斤。有些地方支付一部份的貨幣，一部份的穀物；例如廣西鬱林砍秧女工，每日給米一升，另給毫洋一角。

其次就是用地或是耕畜的使用權來抵償工資。例如寶山縣的『腳塞』，租田一畝，每年要替地主工作二十五天到三十天；棗陽縣的『趕工』，工作一年的代價，是租用四畝到六畝田地，和三四間的房屋。至於用人力去換牛力，

上節已經說到，這裏不再複述。這一種工作報酬的如何低微，可用『三天人工交換一天牛工』這件事實很明顯地表示出來。

最後還有一種最特別的工資形態，就是用娶妻來代替工資，這在西南各省——尤其是雲南都還相當流行。例如雲南的川江新平等縣，貧苦男孩從五六歲或七八歲起始受地主們的僱傭，不支工資；到二十多歲才由地主替他娶妻成家。廣西恭城等縣，有些地主也同年青雇農訂約，工作十年或二十年後，給他一個婢女。

工資形態也像地租形態一樣，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外殼中間，包藏着許多不同的社會性質。自然，貨幣工資是最前進的工資形態；所有資本主義性的僱傭工人，全部採用這種方式。不過我們並不能夠反過來說：凡是支付貨幣工資的，便是資本主義性的僱傭勞動；因為在這裏面，還包含着許多半封建的負債勞役。穀物工資盛行於商品經濟比較不發達的地方，它是一種較落後的工資形態。用土地和耕畜的使用權來代替工資，大多是半封建的雇役勞動，比較穀物工資更加落後。至於娶妻工資更是一種奴隸性的勞動方式；這是最落後的工資形態，它的流行範圍遠不如前面幾種來得普遍。

工資的數量，也同工資的形態保持着一定的聯繫；大

概愈落後的工資形態，勞動報酬也就愈加微薄。這裏我們雖然不能舉出許多統計數字來互相比較；但從上述一切，我們已經不難看出：在這許多落後的工資形態中間，包含着怎樣難以形容的悲苦生活。這些雇役農民常在黑暗中間掙扎，用他們的笨重的步伐，跑完那條艱苦的人生道路；他們除掉打破自己頭頸上的半封建的枷鎖以外，是永遠不會獲得光明的啊！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各省農工僱傭習慣之調查研究陳正謨中山文化教育館叢刊
2. 前書批評余霖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七期)

原书空白页

第六章 耕畜農具和農業資金

第一節 耕畜的分配

勞動工具的進步，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個主要動力。近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以能夠普遍發展，也可說是機械的發明，改進，和廣泛採用所造成的結果。在農業部門中間，由於社會的（例如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自然的（例如農業的季節性）原因，機械的採用雖然不如工業部門來得顯著；然而勞動工具——尤其是勞動工具分配問題的研究，在農業經濟學中，仍然佔着重要地位。

過去中國許多學者對於這個問題，抱着兩種錯誤見解：第一種人以爲只要生產技術（主要的是勞動工具）進步，一切經濟問題便可完全解決，所以再不用去研究什麼生產關係——例如土地問題以至勞動工具的分配問題。可是他們並不知道，在某種社會經濟機構中間，生產技術到了某一階段，便不能夠繼續前進（如在封建社會中間；不能採用機械生產）所以要想單靠技術改進來解決經濟問題，是

件不可能的事情。第二種人以爲土地是農業中的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所以只要研究土地問題，其它問題可以擱着不談。他們並不知道，跟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資本問題（資本家的獨佔勞動工具）所佔地位也在逐漸重要起來。在中國農村中間，土地問題雖然遠比勞動工具分配問題來得嚴重；但我們並不能夠因此便把後者完全忽視。

中國因爲農業生產比較落後，所以直到現在，在各種有生無生的勞動工具中間，耕畜仍然佔有最重要的地位。許多最重要的農業工作，例如犁田，屙水，以至搬運農產，除了人力之外，主要就是利用畜力。然而就是這樣，中國農村中的耕畜還是異常缺乏。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全國農家所有各種耕畜，合計起來平均每戶還是不到一頭（革命前的俄國，所有一耕畜的農家，已被列入貧農層中）。下面是每一百戶平均所有耕畜頭數：

	水牛	黃牛	馬	騾	驢
廿三年估計	22.3	39.6	7.1	7.1	18.5
廿四年估計	21.2	41.4	7.5	8.5	19.3

當然，就連這樣少的耕畜，它的分配還是不平均的。譬如廣西十縣二十四村的耕畜調查（廿二年）便曾告訴我們：在全體村戶中間，有四分之一完全沒有耕畜，還有四分之一却佔有全部耕畜的百分之六十。

	戶數	所有耕牛
無耕牛	25.7%	—
一耕牛	47.9%	40.6%
二耕牛	18.1%	30.6%
二耕牛以上	8.3%	23.8%

上表無耕牛的人家幾乎全是貧苦農民，而有二耕牛以上的人家，主要乃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不但佔有較多的耕畜，而且佔有較好的耕畜。如在廣西的桂林思恩兩縣，富農所有的大多是較好的水牛，貧農所有的大多是較劣的黃牛（這裏一頭水牛的價格大約要抵兩頭黃牛）：

	富農	中農	貧農
桂林水牛	66.2%	39.1%	8.6%
黃牛	33.8%	60.8%	91.4%
思恩水牛	76.0%	66.7%	39.3%
黃牛	24.0%	33.3%	60.7%

浙江嘉興農村調查告訴我們同樣的事實。在那裏的小經營中，無耕牛的戶數佔五八·九七%，所有耕牛在一頭以上的僅佔〇·二〇%；而在大經營中，無耕牛的戶數只佔四·二四%，所有耕牛在一頭以上的却佔了五三·三九%。至於各類經營中間水牛黃牛所佔比率，它的差別更比上表來得顯明：

	小經營	中經營	大經營
水牛	13.93%	51.68%	94.71%
黃牛	86.12%	48.32%	5.29%

由於農村破產，和許多農家的愈向兩極分化，近來無耕畜的農戶一般是在那裏增加起來。譬如陝西部陽（三個農村）無耕畜的農戶，一九二三年只佔二八·八五%，一九二八年已佔三五·七一%，一九三三年更佔四七·二五%。浙江嘉善也有同樣的統計。（註十）因為許多貧苦農民失去耕畜，這使他們對於地主富農們的依賴愈加深刻。如在廣西各地，耕牛租借已是很普遍的現象；無牛農戶租牛使用一年，除掉負責飼養之外，還要繳納租穀一二百斤（百色等縣也有高到三百斤的），或者替牛主（都是地主富農）工作三十日至四十五日。在華北各地，租牛一天，普通要還人工三天。還有許多地方竟用人力代替畜力。如在西北旱荒區域，許多農家因在缺乏耕畜，竟用兩人合挽一犁；這種現象，目下正在其它各地蔓延開來。歐美各國（尤其是蘇聯）用機器代替耕畜，我們却用人力代替畜力；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到中國農業生產力衰落的一般情形了。

第二節 農具和農業機械

（註十）詳見陳翰笙著：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中國農村經濟論）

中國農民不但缺乏耕畜，一般農具的簡陋和殘缺，同樣也達到了可驚的程度。直到現在，除掉極少數的區域利用機器戽水，和間或採用軋花機，攪稻機等改良農具之外，一般還是利用千百年前傳下來的古老農具。譬如最繁重的犁田工作，到今仍然用着極簡陋的舊式犁耙；在缺乏耕畜的地方，甚至於用鋤頭翻土。播種，插秧，施肥，除草等類工作，幾乎全用手和足來代替農具收割也只用着一把鎌刀。而且就連這些簡陋農具，大多數的貧苦農家還是無力購置。徐省立民衆教育館的銅山（八里屯）蕭縣（長安村）兩地調查，告訴我們下列情形：

	銅 山	蕭 縣
有大車的農家	11%	25%
無大車的農家	89%	74%
有犁耙的農家	21%	35%
無犁耙的農家	79%	65%

註：大車是此地最重要的運輸工具

當然，有大車的人家全是地主富農，而無犁耙的人家幾乎全是貧苦農民。根據同一調查，我們可以看到農具分配和耕地分配間的相互關係：

平均每月所有土地	平均每月使用土地	
徐 州	蕭 縣	徐 州

有大車的	16.57畝	35.1畝	40.14畝
無大車的	3.76畝	8.1畝	0.1畝
有犁肥的	11.7畝	32.7畝	28.65畝
無犁肥的	3.41畝	4.9畝	2.2畝

喬啓明先生調查南通崑山宿縣農村情形，結果佃農中間農具不完全的也佔半數上下。下面是『有足用良好農具』戶數佔總戶數的百分率：

	田主	佃農
南通	65.3%	56.8%
崑山	69.5%	40.0%
宿縣	61.5%	45.2%

註：上表所謂『田主』多係自耕農民

小農經營的普遍存在，和極大多數農家的從貧困而至於破產，這使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異常困難。然而這也並不是說，各種新式農具在中國農村中間絕對沒有採用的可能。我們知道在江浙兩省的京滬蘇杭一帶，以及福建廣東若干地方，屙水機器的採用已經相當普遍；有些地方甚至於用電力屙水了。如在交通便利，工業發展的江蘇無錫，用機器屙水的農家已經佔了百分之八十上下；近城區域有半數以上農家採用新式攪稻機（用足轉動的改良農具），遠城區域也達百分之二十。這種現象，竟使若干學者看得興

奮起來：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經營將要——甚至已經在這些區域充分發展，然而在中國農村中間，機械和改良農具雖然帶來了許多進步作用；但是由於農業生產的半封建性，它們却也帶來了若干特殊的意義和特殊的結果：

第一，因為農業機械中間最重要的曳引機和割打雙用機在中國沒有用武餘地，僅僅戽水機的採用，對於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發展是很少幫助的。有些地方，戽水機的採用却引來了相反的結果。如在無錫，因為戽水不必再用畜力，因此耕畜愈加減少；原來用牛力犁田的農家，很多改用人力鋤田。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無錫（莊前孫巷兩村）農村調查（一九三三年），更告訴我們一個奇怪現象，即在富農經營中間，機器戽水反而不如中農來得普遍（因為富農較多利用耕畜）；這也可以看到戽水機對促與資本主義經營，它的力量是如何微弱了。

	富農	中農	貧農
機器戽水田畝	72%	84%	71%
畜工戽水田畝	17%	3%	4%
人工戽水田畝	11%	13%	25%

第二，因為戽水機器大多是在地主豪紳手中；或者歸都市資本家所有，經過地主豪紳之手，然後租給農民合夥使用，因此又給地主豪紳一個剝削農民的絕好機會。尤其

是在水旱年頭，農民因為急於獲得戽水機器，只得典質所有去填地主豪紳們的慾壑。更不幸的是農民負擔着全部戽水費用（根據無錫調查，一九三三年平均每畝要負擔戽水費一元一角），然而所增加的收穫，却要去同地主分享。這種制度，顯然加重貧苦農民們的負擔。

第三，由於都市工商業的衰落，和農村手工業的破產，機械和改良農具的使用，更加深了農村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譬如過去江浙農民利用冬季農閑時間去替地主碾米，也是一筆相當大的收入；現在連他們自己的米，大多也要化了錢去求救機器，空下來的時間又不能夠找到其它工作。所以有些人說：人家的機器是替農民做工，我們的機器是替農民吃飯。這話雖然忽視農業機械對於發展生產上的積極貢獻；然而另一方面，農業機械所帶來的消極的禍害（這種禍害實際乃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半封建的經濟機構所造成的結果）却也不容隨便忽視的。

第三節 農業資金的分析

農業資金的微薄，同樣可以表示中國農業生產的衰落情形。可惜關於這方面的調查和分析，到今還是異常缺乏。根據許多零星統計，我們知道中國大多數的貧苦農民，他們每戶所投農本至多只有百元上下。例如無錫三個農村

每年(一九三三年)所投流動資產(包括種子,肥料,農具添置,以及人工,機工,畜工支出),全體平均每戶還是不到百元。

	每月平均	每畝平均
地主	166.1元	12.54元
富農	197.77元	11.22元
中農	138.86元	8.55元
貧農	64.82元	7.93元
合計	86.16元	9.12元

在富農經營較發展的嘉興,各類經營每戶所投農本(包括耕畜,農具,種子,肥料)計如下表(廿四年調查)

	每月平均	每畝平均
大經營	420.95元	5.61元
中經營	200.08元	7.02元
小經營	91.41元	8.11元
合計	136.63元	7.16元

註: 上列數字係將原表中的房屋(這裏所謂房屋大多乃是非生產的住宅)除去改算。

農本中的耕畜農具,最能表示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譬如在美國,一九二〇年平均每一農場的機械投資有五七金元,牲畜投資有一,二四三金元。但在中國,每一

農家的耕畜投資平均只有三四十元。就在富農經營較發展的嘉興，平均每一農戶的畜牲和農具投資也僅如下表：

	牲畜投資	農具投資
大經營	127.75元	127.04元
中經營	57.65元	66.84元
小經營	21.00元	35.16元
合計	36.03元	43.13元

韓德章先生調查河北深澤的兩村各類經營在牲畜和農具方面平均每戶所投資金，結果也同嘉興統計相差不遠：

	黎元村	南營村
牲畜	5,195元	38.55元
農具	1,278元	66.94元

其次來看種子和肥料的投資，我們可以看到兩種相反的情形：即在種子方面(每畝平均)是貧農經營多於富農經營；在肥料方面(每畝平均)富農經營多於貧農經營。前者表示富農的比較能夠減省浪費(許多貧農為求增加收穫，往往過份多插秧苗)；後者却表示貧農的無力購買肥料，祇得施行較粗放的掠奪耕作。試看無錫三個農村的統計：

	種子和秧苗		肥料	
	每月平均	每畝平均	每月平均	每畝平均
地主	9.41元	0.71元	87.1元	6.55元

富農	12.95元	0.73元	95.78元	5.43元
中農	6.81元	0.75元	43.79元	4.84元
貧農	6.73元	0.82元	34.89元	4.27元
合計	7.38元	0.78元	44.9元	4.76元

關於工資支出，富農顯然多於貧農（貧農所以需要支付工資，完全因為農業俱有季節性的緣故）；這是用不到再加以解釋的。下面是無錫（三個農村）各類經營所支付的工資數額：

	每月平均	每畝平均
地 主	42.72元	3.2元
富 農	49.0元	2.27元
中 農	12.21元	1.3元
貧 農	5.38元	0.66元
合 計	11.9元	1.27元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如何缺乏耕畜，缺乏農具，缺乏農業資金；他們只靠主要靠自己身體上的勞力，用極落後的耕作方法，去向狹小農場上面尋求生活。由於這種不合理的耕作方法，他們所得到的勞動報酬也就異常微薄。根據嘉興農村調查，小經營的全部農業所得，還抵不過家族勞動所應得的工資。這

就是說，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縱然放棄了自己田地所應得的地租，和農業資金所應得的利息，也仍不能得到自己勞動力的全部報酬：

	農業所得	家族勞動 應得工資	餘 額
大經營	136.60元	100.28元	86.32元
中經營	83.47元	71.18元	17.29元
小經營	39.53元	43.64元	9.11元
合 計	59.52元	57.11元	2.71元

註： 上列數字均係每戶平均數額；家族勞動應得工資係按雇工工資標準計算。

如果除去了土地價格和農業資金所應得的利息（按照百分之十計算），那末大農場每畝要虧本一、五四元，中農場每畝要虧本二、五元，小農場每畝要虧本四、四五元。近來國內竟有若干學者，企圖根據耕畜，改良農具，農業機械，化學肥料等的使用情形，來證明資本主義經營的如何已經佔了優勢；但是事實證明，這只能說是白晝夢囃罷了。

第七章 中國現階段的農業經營

第一節 怎樣研究農業經營問題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中國現階段的土地關係和農業勞動等等：在研究土地關係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土地所有的如何集中，土地使用的如何分散；在研究農業勞動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僱傭勞動數量的稀少，和性質的落後。總之，在現階段中國農村中間，最主要的還不是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的對立；而是地主和貧苦佃農的對立。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從農業生產關係的發展過程中間，全面地來研究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換句話說，我們要研究中國農業經營的社會性質。

過去博士教授們的研究農業經營，他們僅僅比較大農場和小農場的生產效率，從而指出大農場或小農場的如何優越。這種研究雖然也有它的重要意義；但是仍不能夠全面地來認識中國農業經營的社會性質。要想正確瞭解農業經營的社會性質，單單研究土地分配固然不夠，就是研究

了農場的大小，也只看到一點表面現象。譬如在二十世紀初年，美國南部各州的農場面積，一般說來比較北部各州大得許多。但是南部各州使用工資勞動的經營只佔百分之三六·五，而北部各州却佔百分之五五·一；就機械和其它農具的價值來看，南部各州每英畝平均只有〇·七一——〇·九五金元，北部各州却有一·五九——三·八八金元。這證明北部各州的中小農場，反而比較南部各州的大農場更加來得進步。

所以，除掉農場面積的大小之外，工資勞動的使用，和經營的集約程度，都是研究農業經營所應當特別重視的事情。在封建社會中間，土地是最主要的剝削工具；支配農業生產和剝削農村勞動大眾的是佔有土地的封建領主。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間，資本變成最主要的剝削工具；這時支配農業生產和剝削農村勞動大眾的主要已是資產階級，土地所有者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機械，改良農具，化學肥料，尤其是工資勞動的大量採用，表示着資本的支配農業生產；這些都是決定農業經營的社會性質的主要標誌。

在中國的農業經營中間，工資勞動還沒有被廣泛利用。一九二六年美國調查，在全體農家中間，工資勞動者佔百分之三九·三，獨立經營者佔百之六〇·六；但在我們中國，雇農在全體農業勞動者中，大概只佔百分之十。至

於機械，改良農具，化學肥料的採用，更加來得微弱。美國（一九二〇年）平均每一農場家畜投資一，二四三金元，機械投資五五七金元；但在浙江嘉興（一九三五年），平均每一村戶（包括地主和農民）家畜投資僅僅三六·〇三元，農具投資僅僅四八·一三元；我們知道，嘉興是地主富農經營比較發展的地方；所以上列數字，一定不會低於全國的平均數的。

在中國的農業生產中間，土地比較資本佔有更重要的地位，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無論地主或是富農，他們最主要的要求，不是更多的資本，而是更多的土地。那末資本對於中國的農業生產，是否到今沒有多大作用呢？那也不然。前面曾經說過，自從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農村以後，中國的農業生產一大部份已經變成商品生產。因此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買辦資本，已經可以通過市場，而來控制中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這就是說：資本雖然不曾佔有農業生產；但是它的力量已經能夠直接間接地來支配農業生產。這種變化，是研究現階段的中國農村經濟所絕對不應當忽視的事情。

若干學者因為資本已經支配農業生產，因此便說：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已是資本主義性的，中國農民實際都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外在的工人』。這種說法，是跑到另

一個錯誤的陣營中間去了。爲什麼呢？因爲一般說來，在農業生產中間，資本僅僅佔有了交換過程，它還不會佔有生產過程。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買辦資本因爲壟斷農產市場，它們可以利用不等價的交換，來榨取中國農民們的血汗收入。但是農業生產的本身，還沒有被資本所徹底改造，它還沒有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關於這點，我們要從農業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來做一個更詳細的分析。

第二節 現階段的地主經濟

在典型的封建社會中間，地主經濟採取着兩種不同的方式：第一是地主把全部土地分割開來租給農民耕種，並向農民徵收現物地租。第二是地主把一部份的土地留着自己經營，另一部份分割開來租給農民；農民一部份的時間耕種自己所分到的土地，另一部份時間無代價地去替地主工作，他們所負擔的主要乃是勞役地租。這兩種不同的方式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便是地主和貧苦農民兩大階級的對立。他們——地主和農民——不是根據自由契約，而是根據着傳統的身份關係，世世代代按照同一方式結合起來；地主對於農民具有超經濟的強制權力。

這種典型的封建地主，在中國農村中間是否還廣泛存在着呢？當然，我們並不能說，中國已經完全沒有封建地

主；例如雲貴等省殘留着的土司，他們對於農民握着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種權力近來已在逐漸消滅），這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有些地方，地主們的超經濟的強制權力到今還很強固；他們有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牢獄，可以自由拘捕和監禁欠租的農民。然而這些情形，實際已經只是殘餘形態，早就失掉普遍性質。有些學者把這現象過份誇大，用來證明中國農村社會的封建性質，這無疑地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封建體系崩壞，傳統的身份關係毀滅以後，農民在名義上已經獲得自由。但是因為大部份的土地繼續握在地主手裏，一般農民還不能夠完全脫離地主們的束縛。這時候也發展着兩種不同的地主經濟：第一是地主根據『自由』契約，把土地分割開來租給貧苦農民耕種；這種農民當然不能夠同地主站在平等地位，他們之間多少留着一點主奴的關係。第二是地主把一大部份土地留着自己經營，僱傭鄰近的貧苦農民來替自己工作；這種農民受着土地或是債務的束縛，他們受僱多少帶着一點強制性質，這就是前節所說到的雇役勞動。這樣兩種地主，同典型的封建地主，已經有了若干很顯著的區別，都可說是半封建的地主經濟。這些方式，在中國的農村中間可以說是異常普遍。前面說過，在華南的水田區域，一般地主大多把他們的土地

分割開來租給貧苦農民，徵收現物地租；這裏主要的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同饑餓佃農的對立。在華北旱地區域，有些地主出租全部土地，有些地主出租一部份的土地，另一部份留着自己經營，他們強制着自己的佃農和負債農民，或用牛力去換人力來替自己工作。這裏主要的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和經營地主，同半封建的飢餓佃農和雇役農民的對立。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間，地主經濟也有兩種方式。第一是土地所有者把全部土地，租給農業資本家去大規模地僱工經營；第二是土地所有者自己僱工經營土地，他們兼有土地所有者和農業資本家的兩重資格。在中國農村中間，這種資本主義的地主經濟，無論前一種或是後一種，都還異常稀少，而且它們的發展前途，很難使人樂觀。例如江蘇南通過去曾有若干大地主，他們購置大規模地僱工經營。但是不久，這種資本主義企業全完了；他們仍把土地分割開來，租給貧苦農民耕種。

在江北濱海的鹽墾區域，那裏有許多大規模的鹽墾公司；其中有六家資本都是超過一百萬元，每家有幾十萬畝土地。這些公司都已具備着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的充分條件；但是它們絕少自己經營，多將土地出租；地租的收入在公司的全部收入中佔絕大的比重。而且幾乎每家公司都在

章程上面規定，墾熟後就實行分地；因此任何公司年代長久，必然就會變成許多私人地主。他們出租土地的方式是永佃制和分租制，出租的對象也是一般貧苦佃農。他們爲什麼不利用這種鉅大的資本和廣大的土地，來實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呢？這是因爲僱農的工資雖然很低，但肚子總非吃飽不可；佃農却能忍飢耐寒地來耕種租地，把節省下來的一切去繳納高額佃租。因此生產雖然衰落，地主們的收入却仍十分豐厚。這些事實說明資本主義經營的發展，在現階段的中國是如何困難啊！

然而也有若干學者，他們企圖根據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一事實，來說明中國地主的向資產階級轉化。他們以爲這種土地已經只是資本的變形；所以現階段的中國地主都是資本主義性的地主。這種說法，表面看來也有相當理由；實際這是很錯誤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把這研究方法演繹開來，那末我們便可以說：在中國農村中間，這種資本主義地主，早在二千年前商鞅變法時候便已廣泛存在。這是何等錯誤的結論呢！

第三節 現階段的農民經濟

封建社會的農民經濟，是自給自足的家庭經營。他們田地上的收穫，除向地主納租之外，餘下來的主要是供家

庭消費。因為自然經濟佔着支配地位；同時牢不可破的身份關係束縛他們，使他們的經濟地位很不容易發生變化。這種自然經濟支配下的封建村落，在現階段的中國雖然沒有完全消滅——例如若干苗寨盤踞着的山嶺中間，還存在着這種一池死水般的古老生活——但就全國而論，它們所佔地位已經異常微弱，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特別是在最近五六年間，跟着公路的開闢，和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深入農村；這些古老農村，也被引入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間去了。

商品經濟相當發展以後，一部份的農業經營向着商品生產轉化。不過這時候的商品小生產者——農民——對於商業資本還保持着相當的獨立地位。這時候的交換方式，主要還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交換；或由小商人在兩者之間負担着媒介的工作。商品經濟進一步地發展，都市中的新興資產階級（或是帝國主義）逐漸把他們的勢力伸張到鄉村中來控制農業生產。這時候的商品小生產者——農民——已經失掉他們的獨立作用，這種農業生產已經隸屬於商業資本，而這商業資本又同都市工業資本（或是帝國主義）發生密切聯繫。不過這時候的農民經營，一般還沒有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大多數的農民還是半封建的飢餓佃農和雇役農民。

農村主要生產者，是農民。農民是農業生產的基礎。農民是農業生產的基礎。

這兩種商品小生產者，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中間，無疑地佔着絕大的優勢。一般說來，除掉沿海幾省之外，市集還在中國的農產交換中間佔着相當的重要地位；這裏獨立的商品小生產者無疑地還廣泛存在。不過前面說過，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已經通過了買辦資產階級，和農村中的地主豪紳而來控制農業生產。因此資本統制下的商品小生產者，在中國農村中間已經佔着更大的優勢。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受着帝國主義和地主豪紳們的雙重剝削，他們過着農奴般的悲苦生活。

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之中，農民逐漸向着兩極分化：一小部份農民富裕起來，向着資本主義路上發展；大部份的農民沒落下去，逐漸形成農村無產階級。所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間，農民這個名稱，已經包含着幾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階級：第一種是富農——農業資本家的經營；他們擴大經營，僱傭工資勞動者來從事資本主義生產。第二種是中農——商品小生產者；這是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成份。第三種是貧農——農村半無產者；他們雖然沒有放棄他們狹小的農業經營，但是主要靠着出賣勞力維持生活。最後便是雇農——純粹的農村工人。

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中間，同時存在着兩種社會關係：第一種是地主和全體農民的對立；第二種是農業資本家

農業與農村經濟常識

和農業無產者的對立。但是前面一種對立，顯然比較後面一種對立佔有更重要的地位。中國農民雖然也在向着兩極分化；但是分化結果，往往並不發展資本主義性的富農經營，而使一部份的富裕農民轉化而為地主。這種現象，尤其在東南水田區域更加來得顯著。一九二九年無錫二十村富農的出租土地統計，便是最好的例子：

	所有土地	出租土地	百分比
16畝以下	181.0畝	1.5畝	0.83
16—32畝	667.1畝	8.4畝	12.05
32畝以上	358.2畝	143.3畝	40.01
總計	1206.3畝	255.2畝	18.67

若干學者以為小農經營在中國雖然佔着絕大的優勢；但這小農經營大多同樣也是資本家的經營。固然我們承認，在德國的巴登和美國的東北各州，這種資本家的小農經營確實廣泛存在。它們因為經營高度集約，並廣泛地採用僱傭勞動；所以我們稱它們為資本家的經營。但是中國的小農經營顯然恰恰相反；耕畜農具以及農業資金的缺乏，使他們只得沿用着幾百年前傳下來的最不合理的古老耕作方法。它們不是繁榮的標誌，而是貧困的淵藪！

還有若干學者，以為中國的小農經營雖然不是資本家的經營；但是大多數的小農單靠田地上的收入不能維持生活。

活，他們必須時常出賣勞力，所以他們已是農村無產階級。固然，這種小農必須時常出賣勞力，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然而中國因為地主富農們的資本主義經營太不發達；同時大多數的小農仍然不能解脫地主債主們的重重束縛；因此他們雖然必須出賣勞力，但是很少機會可以自由地去受人僱傭。很多小農只能去做半封建的負債勞役，或是把他們的勞力白白浪費。那末誰敢相信，中國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充分發展；誰敢相信，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正在那裏自由發展起來呢？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中國農村經濟現階段性質之研究陶直夫中國農村經濟論
2. 中國農業生產關係的檢討余霖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五期)
3. 現代中國農業經營問題孫曉村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卷第二期)

原书空白页

第八章 農產商品化和農村市場

第一節 中國農產商品化的特質

商品生產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所以中國有一部份學者，他們看到農村中的商品生產已經相當發展，因而斷定資本主義已在農業生產中間佔着優勢。顯然，這是一個太粗率的結論。因為稍有經濟科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商品生產是有兩個階段：第一是單純的商品生產——小生產者的商品生產；第二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資本家的商品生產。只有後一階段，方才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在中國，商品生產的發展，雖然已經有了二千多年的歷史。但是這時候的商品生產，主要還只限於工業部門，和若干經濟中心——都市，至於一般農民，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在那裏過他們的自給自足生活。農產商品化的普遍發展，顯然是帝國主義侵入後的事情。所以中國農業中的商品生產，與其說是國內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所促成，

爾可說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所造成的結果。前面曾說，帝國主義爲要獲得廉價原料，常常利用不等價的交換——即用低於價值或生產價格的價格來收買農產，盡力壓榨中國農民；這便造成了中國農產商品化的特殊性質。

中國農產商品化的發展情形，首先從原料種植的增加上面表現出來。例如東北各省的大豆，東南各省的蠶繭，河北、山東、陝西等省的棉花，和山東、河南、安徽等省的菸草，都是最近數十年間發展起來的商品作物。本來，這些商品作物，最適宜於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但在中國農村中間，一方面農產價格的低落，阻礙地主資本家的農業投資；另一方面許多貧農因爲負債關係，迫切需要貨幣，迫得他們向商品生產方面發展；因此若干種的商品作物，在貧農經營中間，反而比較地主富農經營更加來得普遍。例如山東等省菸草調查告訴我們，種菸田畝在全體田畝中間所佔比重，貧農一般是要高於富農。這也是中國農產商品化的一個特殊現象。

其次，跟着農村破產的日益深刻，原來當作農民們糧食的米麥，現在也在那裏向着商品生產方面迅速發展。華北農民大多終年吃着高粱，番薯，小麥早已變成不能輕易到口的奢侈品；華南農民，也多吃着稀粥，雜糧。農民們在農忙期和季節才吃米飯（在這災荒年頭，農民們的普通

食料，已經降到樹皮，草根，觀音粉等）。於是大米小麥，也都變成專為出賣而生產的商品作物了。在比較富庶的省份，多數農民雖然仍用米麥充飢；但是他們往往因為還債完糧等等關係，被迫着在收穫以後出賣全部或是大部份的糧食；到了春荒時期再向市場購買。這種商品生產，自然並不意味着農業生產的向資本主義自由發展；恰恰相反，它是貧困和飢餓所造成的悲慘結果！

所以在中國農村中間，我們可以看到性質不同的兩種商品生產：第一是地主資本家的商品生產，例如番禺若干鄉村的菓園經營，和上海附近許多菜園經營，往往僱備十個八個長工，實行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許多墾殖區域，甚至於在浙江，湖南若干濱湖區域的水田經營中間，這種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也已相當發展。但就全國範圍而論，這種商品生產還只佔了很小的比重。第二是貧農們的商品生產；例如上述菸草經營，五畝以內的小經營佔絕大多數。各地城市附近的菜園經營，大多也只一畝二畝；農民自己種植，自己挑到市場上去出賣。這種商品小生產者，在中國農村中間佔有更顯著的地位。

若干學者因為這種商品生產大多已受商業資本，甚至於受帝國主義者的支配，就說這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但是我們以為，資本是否支配這些商品生產是一個問題，

這些商品生產是否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是一個問題。中國大多數的農民，雖然已經變成資本支配下的商品小生產者，中國農民們的血汗，雖然有一部份變成商業資本和帝國主義者的超額利潤；但是這種生產，決不能夠完全把它當做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關於這點，前面已經一再解釋，這裏不再複述。

第二節 商業資本的剝削方式

在資本家同資本家之間，或者小生產者同小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普通是以等價交換為原則的。但是中國農村中的商品交換，主要乃是資本家同小生產者——帝國主義者同半殖民地農民間的不平等的交換。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買辦資本，可以利用它們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利用中國農民們的分散和貧困，採用不等價的交換方式，來取得肥厚的超額利潤。而且帝國主義者的掠奪廉價農產，除掉利用買辦資產階級之外，往往還要通過鄉村中間一層層的殘餘封建組織。因此中國農民在這交換過程中間所受到的剝削，更加來得苛重。

中國農民出賣農產，因為必須經過若干重的中間剝削，因此都市和農村中間的農產價格，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異。根據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江西臨川二·一二八石

穀子(軋成一石白米)，經過南昌九江運往上海，加上運費、行佣，以及各種中間剝削，它的價格會從四·二五六元加到八·五八一元(中間包括軋米費用二角六分)！而且在這中間，我們還沒有把一重重的地方稅捐計算進去。所以在上海一石白米雖然賣到十元左右；但是內地農民所得到的代價，往往還不夠抵償生產費用。近幾年來洋米洋麥所以能夠充斥沿海各大都市，這也是個重要原因。

其次，農產價格除掉地域上的差異之外，還有時間上的差異。前面說過，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因為急着還債完糧等等；常在收穫以後出賣全部或是大部份的產物。農村商人往往利用農民這種弱點，一到收穫時候，故意抑低農產價格。農民明明知道這時出售農產異常吃虧，但被債主稅吏追逼，除掉少數富農之外，只能聽憑人家宰割。因此各地鄉村中的糧食價格，在收穫前後相差常在半數以上。

更苛刻的剝削，便是農村商人們用抵押方式來預買農產，這在各種商品作物都是很普遍的現象。例如豫西各縣，商人預買『期花』(棉花)，常達數百萬元；所出代價，往往只及市場價格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這種期花買賣，在其它各省的產棉區域也是同樣普遍。在若干種菸區域，種菸農民往往因為缺乏資金，去請商人貸款，並把菸草按照半價預先賣給貸款商人。不僅原料如此，就連各種主

要糧食，也可以在未成熟前預先出賣。所謂『賣青苗』，『於禾花』等，這在各省都是相當普遍。在這些交換方式中間，自然常常包含着很濃厚的高利貸的性質；而忍受這種苛重剝削的農民，常常就是農村中間最貧苦的階層。

中國度量衡的參差複雜，也是農村商人剝削農民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例如安徽祁門茶商收買茶葉；普遍是用升二兩秤；比較十六兩秤要大百分之三八，比較新制市秤要大百分之六二。農村復興委員會調查各地斗斛，發現一個有趣的『定律』，就是愈到內地斗斛愈大。例如江陰宜興每石要比無錫大六七升，無錫又是大於上海。幣制的複雜和洋價漲落，也使農民在出售農產時候多受一重損失。內地農村因為現銀缺乏，鈔票又是真偽難辨，所以大多採用銅元本位。商人利用這點，盡力操縱兌換行市；例如通過銅元跌價這種方式，而來抑低農產價格。

最後，在帝國主義者和買辦商人直接支配着農產市場的場合，雖可以排除若干中間階層；但是農民所受到的剝削，決不能夠因此減輕一點。例如英美煙公司在山東河南等省收買菸草，常用減等（例如甲等算乙等）扣磅（例如十磅算八磅）貼水，加開等等方法剝削種菸農民；它的殘酷程度反而勝於舊式的農村商人。（註十一）日本帝國主義者

（註十一）參看中國農村二卷七期英美煙公司和豫中農民。

在東北收買棉花，大豆等類農產，也常靠着所謂『統制政策』，實行最殘酷的掠奪。這些都是最顯著的例子。

上述各種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大多數的農村商人，並不根據利潤平均法則而來取得資本主義上的商業利潤，他們常常憑藉自己在鄉村市場上的特殊地位，破壞價值法則，而對小生產者——農民實行最殘酷的剝削。尤其是那些高利貸的交換方式（例如預買農產），更赤裸裸地表示着貧苦農民對於農村商人的隸屬關係。在這裏，所謂自由契約，根本只是法律上的一個空洞術語而已。

第三節 農村市場和農產物的交換

中國農村中的市場組織，同樣也殘留着很濃厚的封建色彩。在這裏，中世紀所流行着的市集制度，在大多數的內地農村中間還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廣西『一般鄉村，甚至龍州百色等處都市中間，到今還殘留着三天一墟（市集）的古老制度』。在貴州水定等縣，不論『城市，村市，都是定期舉行。城市每四日一次，村市每六日一次。農民各就近處市集，以物賣錢，更以錢買所需之物』。這些農民都從四面八方匯集攏來，排列大路兩旁，組成一個臨時市場；到了交易完畢，便又各自分散。在這市集中間，普通也有幾家固定商店，例如糧食行和雜貨舖等。

比較市集制度更普遍的，便是一年一度（或者一年數度）舉行的廟會制度。這種廟會雖然大多帶着很濃厚的宗教色彩；但是農產，農具，以及農民一切日常用品的交易，無疑地是廟會中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參加廟會的農民，一般比較市集更加廣泛，交易時間也要長得許多，往往延長到兩天三天。廟會制度的普遍存在，我們只要舉出上海靜安寺的廟會，到今還在年年舉行這件事實，便可充分證明。當然，在這臨時市場——市集，廟會——上面，已經陳列着許多五光十色的外國商品——尤其是廉價的劣貨。不過參加交換的人，大多還是鄰近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外來的遊行商人。

中國農村市場上的商品交換，採取着各種不同的方式：第一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交換，在這兩者中間沒有商人來做交換媒介。這種最落後的交換方式，已經不佔主要地位。第二是由農村中的小商人來擔任交換媒介工作；這種商人往往自身就是附近鄉村中的貧苦農民。他們所做工作，與其說是剝削商業利潤，甯可說是變相的出賣勞力，這也不是最主要的交換方式。第三便是來往於都市和鄉村間的遊行商人，他們輪流着到各個市集中去推銷都市甚至外國商品。他們自身雖然是個小有產者（小本商人），但已成為帝國主義和都市資產階級最下層的根鬚。

。華聯社編輯部編印，吉商玉同家對會專販普

④ 農村中的地主豪紳，常在農村市場上面佔有很顯著的特殊勢力。所以農村市場上面更重要的交換方式，便是第四，由糧食行和雜貨舖等商店來做這種交換工作。這種商店常在農村中間佔有壟斷地位，他們的主人就是當地有勢力的地主豪紳；他們往往又同都市中的買辦資產階級以至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發生聯繫。前面所說各種高利貸的交換方式——如用典押方式預買農產，或在秋收以後廉價收買農產；到了春荒時期高價出售等等——常替這種農村商人保證最豐厚的超額利潤。

第五，對於各種商品作物，帝國主義（或者民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買辦商人常到農村裏來直接收買；在這場合，地主豪紳自然也是他們很重要的羽翼。例如江浙廣東等省所產蠶繭，常由絲廠，買辦，或由他們直接間接貸款幫助鄉村中的地主豪紳，開行收買。皖贛兩省所產茶葉，一向是由上海許多茶棧，向洋行或者銀行息借鉅款，貸給產地茶號；茶號向茶農收買茶葉以後，概歸貸款茶棧賣給各大洋行出口。山東安徽等省英美煙公司的收買菸葉，採用更直接的方式；他們自己到產地去向菸農直接收買。在這些交換方式中間，帝國主義者和買辦商人常常站在更直接的支配地位。

最後，除掉上述以外，還有兩種最新鮮的交換方式；

這就是由銀行包辦的運銷合作，和由政府出面，實際主要也由銀行包辦的統制貿易。關於前者，中華農業貸款團在陝西辦理棉花運銷合作事業，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這些銀行因為同時舉辦農本貸款和棉花抵押等類事業，而且佔有打包運輸等類工具；所以它們名義上面推行合作制度，實際也常採用各種高利貸的交換方式。關於後者，最近江浙兩省銀行和絲廠主人們的蠶繭統制，(註十二)和皖贛兩省銀行和買辦支持着的茶葉統制，(註十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這裏面，銀行，買辦，民族資產階級，排除或者改組鄉村中的封建式的商業組織，這樣來鞏固自己的壟斷地位，和更有力地榨取農村中的勞動大眾。當然，在他們的上面，同樣也有帝國主義勢力，來做他們實際上的主人。

(註十二)參看中國農村二卷七期蠶絲改良會統制下的江浙蠶農

(註十三)參看中國農村二卷六期反帝反封建的半壟制

本章重要參攷資料：

1. 中國農產商品化的性質及前途 孫曉村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第一卷第一期)
2. 中國農產物的原始市場 馮和法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三期)
3. 商業資本的本質問題 Dubrovsky 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五期)

第九章 中國農村中的高利貸

第一節 高利貸的社會性質

收租放債，向來是中國地主們的兩條生財大道；同時也是中國農民頭頸上的兩條最沉重的鐵鍊。利息的負擔同田租的負擔比較起來，它的重要程度雖然不如佃租，但是比較佃租更加來得普遍。例如民國二十二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全國農戶中間，負擔佃租的農戶已有百分之五五，而負擔利息——即負債的農戶更達百分之六二。從這數字中間，我們可以看出大部份的小自耕農，同樣已經做了高利貸的俘虜。

高利貸和資本主義的借貸資本，包含着完全不同的社會性質。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間，債權人和債務人是站在平等地位；後者——債務人——利用借進來的資本擴充企業。獲得利潤以後，分出一部份來支付利息。因此他們同樣屬於剝削階級，共同分割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高利貸的借貸關係和這完全不同，債務人是站在被剝削

的地位。他們借債的目的，不是爲着取得企業利潤，而是爲着維持生活；所以他們常常要用自己的血汗來支付利息。因爲這種不平等的借貸關係，所以負債農民常常要在債主前面低頭屈膝，他們大多屬於農民中間最貧苦的階層（不過赤貧農民——例如雇農——因爲缺乏保證，常被債主們所拒絕）。

高利貸本來可以存在於各種社會形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甚至比較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間；在中國，它也已經有了二千多年的歷史。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農村中的借貸關係雖然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但在商品作物較發展的區域，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的勢力，已經滲入高利貸的網絡。它們爲着抑低農產價格，常在收穫以前放出大批款項，來做高利貸商業（例如預買農產）的後盾。尤其是在最近幾年，由於銀行資本的侵入農村，高利貸同都市資本中間的聯系，更在那裏一天天地密切起來。跟着這種轉變，農村中的高利貸者也就逐漸失掉他們的獨立地位，變成帝國主義，買辦和銀行資本家的根蠱。

自從都市資本侵入農村以後，中國農村中的高利貸便向着兩個方向前進。第一，在接近巨大都市，而且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方，利息相當低落，借貸數額在各類農民中間都在那裏普遍增加。這種現象——尤其是富

農負債數額的增加——表示着高利貸的向着資本主義的借貸關係徐徐發展。民國二十二年番禺十代表村調查所得到的結果，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負債戶數 對總戶數	平均每戶 負債數額
富 農	43.6%	223.4元
中 農	51.8%	122.6元
貧 農	53.9%	98.8元
雇 農	22.9%	19.2元
合 計	53.2%	106.9元

第二，在一般內地農村中間，由於資金的枯竭，和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不能自由發展，利息是在那裏逐漸提高；可是借貸數額並不跟着增加，甚至還在那裏反比例地減少下去。因為一般富農既不願意受這高利貸的剝削（他們往往還是高利貸者），許多貧農也因為失掉支付能力，被摒棄在借貸圈外。在這裏，非但資本主義的借貸關係沒有發展可能；就連封建性的高利貸也跟着農村破產而陷入奄奄待斃的境地。民國二十三年廣西的蒼梧思恩兩縣調查報告，告訴我們愈到內地，這種現象愈加來得顯著。

負債戶數對總戶數的百分比

番 橋

思 恩

富農	20.8%	17.5%
中農	49.0%	11.0%
貧農	61.2%	43.4%
合計	58.1%	31.0%
借錢月利	2.4%	4.4%

就全國範圍而論，後面一種趨勢顯然遠比前面一種來得普遍。尤其是在世界農業恐慌侵入中國以後，跟着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衰落，就連沿海各地，也在那裏向着後一方向發展。因此我們可說：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農村，並沒有改變農村借貸的高利貸的性質，甚至於把這種性質愈益加強。這是中國農村借貸的特質。

第二節 流行着的幾種借貸制度

中國農村借貸的高利貸的性質，首先從借貸形態和利息形態上面表示出來。直到現在，中國農村借貸中間，糧食借貸幾乎還同貨幣借貸佔着同樣的重要地位。自然，這種落後的借貸形態，常常伴隨着殘酷的剝削方式；例如時期的短促（普通都在半年上下），利息的苛重（普通要比貨幣借貸高出一倍以上）都是糧食借貸的最顯著的特色。根據民國二十二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糧食借貸和貨幣借貸的普遍程度約如下表：

	借債戶數 佔總戶數	利 息
糧食借貸	48.0%	85.2%(年利)
貨幣借貸	56.0%	34.0%(年利)

糧食借貸因為包含着高利貸的特色，所以它在貧農層中特別來得普遍。前次講過，中國農村中的貧苦農民，常在秋收以後出賣全部或是大部份的糧食；因此到了春荒時期，只得去向地主，富農，商人借穀維持生活；這也是糧食借貸在貧農層中普遍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關於各類農民借錢借穀比較，我們雖然沒有全國性的材料；但是民國二十三年的蒼梧農村調查結果，很可以做參攷。

	借錢戶數	借穀戶數
富 農	66.7%	33.3%
中 農	50.0%	50.0%
貧 農	28.4%	71.6%
合 計	31.2%	68.8%

負債農戶的支付利息，往往採用更複雜的形態；即在錢息穀息之外，有些地方還用勞役低價利息。譬如在廣西各地，無論借錢借穀，都可以用糧食支付利息。『蒼梧借洋一元，普通加還利穀五斤六斤，桂林柳江邕寧各區還加利穀十斤左右。時期三四月至一年不等。糧食借貸利率更高，普通借穀一担，加收利穀四十斤至八十斤；時期少則

四月，多則半年。『思恩河池一帶，有時也用勞役支付利息，大概借洋一元，每月做工一天，借米一擔，每月做工五天』。從上引事實中間，我們可以看出愈落後的利息形態，它的剝削也就愈加苛重。如在上述各地，貨幣利息雖然平均不過月利百分之四，但是糧食利息一般是在月利百分之十上下，勞役利息更達月利百分之二十！

其次，從利息的苛重，我們更可以看出中國農村借貸的高利貸的性質。根據前引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就連貨幣借貸，年利也達三分四厘，其實這還不能表示貧苦農民實際所負擔的利息。因為：第一，貧苦農民大多借穀，他們所負擔的利息，平均要達年利八分五厘以上，這在前面已經詳細敘述。第二，同一地方常常通行幾種利率；大概愈貧苦的農民，他們所負擔的利率愈高。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農村借貸利率，很多是在四分以上；錄下以供參考，

1—2分	9.4%	2—3分	31.2%
3—4分	31.3%	4—5分	11.2%
5分以上	12.9%	合計	100.0%

第三，貧苦農民借款時期，普通是在一年以下（因為他們沒有田地來做抵押，很不容易得到長期借款），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農民借款有百分之二·六是在

半年以下，半年到一年的佔百分之六四·七，一年以上的佔百分之二二·六。這些不滿一年的借款，往往要付一年利息。就是按月計算利息，也比長期借款更加來得苛重。例如廣西各地平均，長期借款是月利百分之二·九，短期借款是月利百分之三·九。至於糧食借貸，一般是在播種時期借出，收穫以後繳還；所以嚴格計算起來，負債農民實際所負擔的利息，往往超過月利百分之十！

中國農村中的借貸制度，除掉上述借錢借穀以外，還有兩種比較特殊的方式；那就是典當和合會。典當在全國各地都很普遍，它的對象一般也是貧苦農民。典當利息，低的地方月利二分，高的地方三分四分。可是除了正式利息以外，往往還有許多額外負擔。例如廣西的桂林柳州一帶農村中間，通常每一市集總有幾家『代押』；『代押』收下來的典當物品，大多還要送到城市中『餉押』轉當。因此農民在『代押』中間典押衣物，常常還要預先扣掉一筆『挑力』。如果典當期滿無力贖取，典押物品就被無條件地沒收，這時農民自然受到更重大的損失。

合會普通可分錢會穀會兩種。錢會大多是地主富農們的組織；他們碰到婚喪大事，常用合會的方式來代替舉債。錢會因為帶着親友互助性質，因此利息普遍並不很高。不過有些地方，行一種『標會』，利息高低是用投標的方式

來決定；這時會友爲着迫切需要貨幣，往往只得承認極苛重的利息。

穀會通常是中農貧農們的互助性的結合；他們在豐收時候集合多少糧食，用比較低的利息借給會友。例如廣西各地，過去就曾流行這種穀會制度。然而，跟着農村經濟的澈底破產，這種最原始的合作組織，現在已經迅速跑上沒落的道路了。

第三節 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

半封建的土地關係，是繁育高利貸的最有利的社會基礎（因爲那些半封建的小自耕農和饑餓佃農，最容易受高利貸的束縛）；同時商業資本的控制農業生產，更加容易引起高利貸的猖獗。因此，高利貸在農村中間，常常自始就同地主、商人密切結合起來，許多農村高利貸者，往往就是地主和商人的化身。民國二十二年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全國二十二省農村借款的來源，得到了下列的結果：

銀行	2.4%	合作社	2.6%
典當	8.8%	錢莊	5.5%
商店	13.1%	地主	24.2%
富農	18.4%	商人	25.0%

上表告訴我們，在農村放款中間，地主和商人佔着最

顯著的地位。而且我們知道，所有典當、錢莊、商店，它們的主人大多也就是這些地主、商人。這樣看來，他們到今仍然壟斷着絕大部份的農村高利貸業；至於喧傳全國的銀行和合作社的放款，合併起來也只佔了農村放款中的百分之五罷了。

高利貸同地主、商人的結合，並不到此爲止。地主商人往往利用高利貸這槓桿，來加重他們的半封建的剝削。首先，地主們的兼併土地，常常通過高利貸的迂迴過程，這樣來達到他們廉價掠奪的目的。在中國農村中間，地主們收買土地，普遍採用下列幾種方式：

1. 抵押 一般長期借款，都用土地來做抵押物品。過了若干年後，本利累積，無力償還；債主便可以沒收土地，或者添幾塊錢變成絕買。這樣買下來的土地，所出代價常在普通地價的半數以下。

2. 典當 典當同抵押不同之點，就在後者(抵押)採用借貸方式，負債農民按期支付利息；前者(典當)却要暫時移轉地權，負債農民不付利息，按期繳納佃租。典當土地所出代價，普通常在購買土地所出代價的半數或是三分之一上下；但是債主却可以收受全部佃租，甚至還可以由負債農民自己負擔田賦。負債農民雖然保持着回贖的權利，可是實際能夠回贖的，至多只是少數中農而已。

在盛行永佃制度的地方，還有一種『賣田不賣耕』——出賣田底，自己保留田面——的習慣。負債農民爲着保留土地的使用權利，不惜犧牲一部份的地價。在江蘇的淮北各縣還有一種『當空』制度——負債農民自己雖然沒有尺寸土地，也可以向債主憑空典當，承認按照普通租額繳納佃租。這樣地主們的掠奪土地，甚至可以超過自然限度，許多貧苦農民所有土地竟會變成負數。往往種了兩三畝田地，要繳五六畝佃租。

其次，農村商人也常採用高利貸的方式來收買農產，這在前一章中已經談到。他們普通所採用的方式也有下列兩種：

1. 賒賬 他們利用農民無錢購買肥料、種子等等機會，實行賒賣；約定收穫以後要把全部農產賣給債主。這時農產價格，自然也就免不掉要受債主們的操縱。這些農村商人除掉廉價收買農產以外，同時還要故意抬高賒賣商品的價格；這種高利貸的剝削，往往會在短短三四個月中間得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息。

2. 預買農產 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放債給農民，約定在收穫以後用農產物來抵債。農產價格因爲常在放債時候預先議定，所以總比市場價格低得許多。這是高利貸商業的一種更普遍的方式。

地主、商人們的採用高利貸的剝削方式，一方面加重了窮苦農民的負擔；另一方面可使佃租和商業利潤帶着愈加濃厚的半封建的特色。同時在這方面，富農所處地位，也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中國大部份的富農，他們對於借貸關係，也和他們對於土地關係一樣，是同資本主義各國的富農站在相反的地位。這就是說：他們並不租進大批田地，借進大批金錢，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恰恰相反，他們往往出租一部份的田地，出借一部份的金錢或者糧食，去向貧苦農民徵收苛重的佃租和利息。因此在中國農村中間，『富農』這個名稱，也像『雇傭勞動』一樣，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它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產物；但是我們同時不能否認，在這新的形式中間，無疑地還包含着很多舊時代的殘渣。

最後，跟着農村放款和農村合作運動的廣泛發展，銀行資本在農村借貸中間逐漸佔有較顯著的地位。不過直到現在，銀行資本既然沒有剷除農村中的舊式高利貸者，也沒有動搖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在農村中的鞏固勢力。他們一般仍同地主豪紳合作，通過他們而來繼續高利貸的剝削。因此中國農村中的借貸關係，縱然發生若干形式上的變化，但是仍然保留着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關於這點，我們還要留待此後詳細論述。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現代中國的農業金融問題 孫曉村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第三卷第四期)
2. 高利貸資本論 王寅生 中國農村 (創刊號)

第十章 中國農村中的田賦和稅捐

第一節 田賦的繁重

除掉上述各種剝削之外，田賦和各種苛捐雜稅，同樣也是中國農民肩背上的重大負擔。中國財政制度——尤其是地方財政——的特色，在收入方面，絕大部份是從農民身上得來；而在支出方面，主要部份又是用作『維持秩序』的所謂地方保衛經費。孫曉村先生在地方財政對於農村經濟的影響（中國農村月刊二卷九期）一文中間指出，『宗主國對殖民地最不高明的統治，便是一方面徵收苛重的捐稅，一方面組織大量的鎮壓機關和武力。不幸的是中國地方財政制度，在對農村的關係上，正走入這條不高明的道路，正暴露了殖民地國家中封建統治的特質。』

中國的地方財政，一向是把田賦當做主要基礎。根據二十四年度的預算估計起來，全國各省各縣（中央預算除外）每年收入，至少當有五萬萬元。在各省政府收入（除掉中央輔助款和借款）中間，田賦大約佔了百分之四十上下

；在各縣政府收入中間，田賦更佔百分之六十以上。自從民國元年以來，各地軍閥官僚，常把田賦當做封建割據最主要的財政基礎，因此田賦數額幾乎年年增加。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全國歷年田賦增加指數計如下表

	元年	三十年	卅一年	卅二年	卅三年	卅四年
水田	59	100	107	108	108	101
旱地	62	100	109	111	111	103
山坡	61	100	103	111	111	104

因為田賦正稅向有定額，所以增加得最快的便是田賦附加。據民國二十三年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江蘇省各縣的田賦附加有一百零五種，浙江全省竟達七百三十九種。附加同正稅的比率，在淮陰，漣水，如皋，崇明，高郵等縣，附加超過正稅十二倍至十六倍，海門超過二十六倍，灌雲超過三十倍。又據稅捐整理委員張棧報告，河南田賦正稅每兩二元二角，但『在內鄉縣內，田賦附加即達五十元之鉅；據謂其它各縣附加有達八十元者。』這已超過正稅三四十倍！這雖然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是也可從此窺見各地田賦制度的混雜情形了。

比較更奇怪的，便是田賦的預徵。中國預徵田賦的地方有十幾省之多，而最著名的便是四川；這裏一年四徵還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多的地方一年中間曾經徵到十三四

次。根據報紙零星記載，許多縣份（例如巴縣，德陽，什郊）已經預徵到民國四五十年，更有預徵到民國六七十年（例如樂至）甚至八十年（例如新繁）的！這樣橫徵暴斂，竟使各縣所徵收的田賦，往往超過總收穫的半數。下面是前年四川每兩糧田的產值和田賦數額（一年四徵和兩次勸赤經費）：

	產值	田賦	田賦佔產 值中的%
丹 陵	98元	45元	45
眉 山	130元	86元	65
江 安	145元	142元	99

由於田賦繁重，許多自耕小農往往因此陷於破產。在前兩年，像江蘇崑山這樣富庶的縣份，也有農民請求將田產抵稅；去年魯北冀南，竟有農家請求將兒女抵稅；至於華北一帶，因為攤派的漫無限制，農民爲了避稅，把田契貼在門上，帶着兒女全家出走的，不知道有多少；這在四川自然也是很普遍的現象！

前年五月，國民政府召開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決定減輕田賦。議定從該會閉幕日起，永遠不再增加附加；至於以前各種附加，也要分期減除，使不超過正稅數額。因此在表面上，廿三年的田賦並未增加，廿四年更顯著減少。然而根據許多事實推測起來，最近兩年田賦是否真的不

再增加，那還是個疑問；至少減輕田賦是大成問題的。爲什麼呢？因爲第一，最近幾年受了災荒和農業恐慌的打擊，農田收入減少；同時地價也已顯然跌落。因爲收入和地價跌落的速度，比較田賦減輕更快；所以田賦對地價的比率，反倒增高起來，這表示地主農民們的實際負擔比前只有加重。下面是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田賦對地價的比率）：

	田	廿二年	廿三年	廿四年
水	田	2.67%	3.05%	3.09%
旱	地	2.74%	3.26%	3.49%
山	地	3.05%	3.46%	3.74%

第二，許多省份，民國廿三年甚至廿四年的田賦還在那裏增加起來。還有許多省份表面雖把田賦減輕，實際還是繼續徵收。例如減輕田賦成績最好的浙江省，便把若干附加剔出田賦範圍以外，改徵新稅；如把保衛團畝捐改爲住戶捐，商舖捐，把教育畝捐改爲學穀捐等。因此所謂減輕田賦，只是換了一個名目。比這更妙的是山西省的若干縣份在田賦裁減以後，因爲無法抵補，呈准財政廳向人民接村攤派。這至多只是把地主豪紳應繳田賦中的某一部份，分攤到農民們的頭上罷了！

第二節 稅捐的苛雜

田賦之外，對於農村經濟影響最重大的，還有鹽稅統稅等類苛捐雜稅。根據上海銀行週報記載：鹽稅的複雜，即以十省而論，名稱與稅率已有二百九十九種。因此在消費者所支付的鹽價中間，鹽稅至少佔了十之六七，此外鹽商們的獨佔利潤約佔十分之二，鹽民所得只佔鹽價中的十分之一。最近兩年雖然廢除苛雜，但是各地鹽民仍在那裏紛紛反抗（例如去年的平鄉民變和今年岱山漁鹽民的暴動）；這正說明鹽稅的苛重，如何影響到鄉村民衆們的生活。至於豬捐，牛捐，鮮繭捐，烟草捐，以及各種農產品稅，更使農民生計受到直接打擊。這些稅捐往往重重疊疊，一徵再徵；而且正稅之外，還要加收附捐。例如教育捐，民團捐，水利捐，公路捐，航空捐，救國捐，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綏遠省政府的主席二十二年告民衆書中曾有這樣的自白：『各縣財政混亂，土劣漁利中飽；人民所負擔的附加攤派及雜捐等，已超過正稅七八倍甚至十餘倍不等』。這決不是綏遠一省的情形，而是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

苛捐雜稅無論怎樣還有一個限度，至於無限止的攤派勒索，比較苛捐雜稅還要來得殘酷。財政部稅捐整理委員會報告河南省的攤派情形：『有由省令攤派者，有由縣長

呈准攤派者，有由縣長擅行攤派者，並有由區長呈准攤派，及區長私自攤派者。而每一攤派又層層加重，層層剝削，省方若需款五千，人民所攤者至少在一萬元以上。其實區長以外，民間也常強派款項。例如安徽當塗保安隊長擅收過境米捐，每船六元至八元，約計侵蝕萬元以上。陝西某縣民團團長，曾向各村人民所養牛馬驢騾，不分好歹，每頭派洋十元；迫得農民多把牲畜牽到省會出賣。

至於軍隊所攤派的所謂『兵差』，更加駭人聽聞。中央研究院統計民國十八十九兩年中間，全國一九四一縣中，負擔兵差的有八百二十三縣，已達百分之四二以上，尤其是晉，陝，直，豫，魯五省最為普遍。兵差共分力役，實物，錢幣三種，實物比較最多。例如麵粉，衣服，稻草，車輛，米，麥，牛，馬，豬，雞，被褥，鞋襪，都是隨地徵收。兵差數額，往往遠過田賦。例如十九年四月至十月，河南的商邱兩縣拓城所供兵差，四十倍於地丁正稅；十六年十一月到十七年五月，山西雁北十五縣的兵差，更比地丁正稅大出二百二十六倍。去年社會科學雜誌發表冀察兩省兵差數額，也已超過田賦幾倍：

	每戶平均	每人平均	每畝平均
河北	44.6元	7.5元	3.17元
察哈爾	62.47元	11.35元	1.94元

自從全國財政會議決定廢除苛雜以後，各省紛紛響應，表面看來似乎還有相當成績。前年十月十二日中華日報詳載過去三個月中各省市廢除苛雜數目，已有一千多種，稅額約近一千萬元（其中廣東幾佔半數）。自然，這還只是苛捐雜稅中間最苛雜的一小部份。例如江蘇省在廢除苛雜一百三十種後，財廳派員密查，據報各縣苛捐雜稅，至少還有二百多種。同時各地新增加的稅捐，却仍層出不窮。例如廣東省是廢除苛雜最努力的一個省份；可是最近各報仍在登載廣東稅捐的混亂情形，而最腐敗煙捐賭捐仍然是省庫中的主要收入。甚至在號稱模範省的廣西，禁煙罰款（煙捐）和防務經費（賭捐）也曾佔了全省稅收中的十之六七。千家駒先生曾說：『減輕田賦附加與苛捐雜稅，不是一個中央財政當局有沒有決心的問題，而是地方政府有沒有辦法的問題』，所以中國政治經濟機構的本身，實際就是『減輕田賦』和『廢除苛雜』的最主要的障礙！

第三節 田賦稅捐的徵收制度

『中國農民所負擔的捐稅，不僅種類複雜，稅率苛重；而且徵收的時候，額外浮收，任意勒索，欺騙中飽的情形不一而足。所以單單從有形的捐稅上觀察，還不夠瞭解苛徵暴斂的實況；而最殘酷的苛徵暴斂，却是在徵收的方

式及其過程中。中國的徵收制度，尤其在田賦方面，癥結太深，結果使得人民常在負擔之外有額外負擔，以及額外的額外負擔；而公家收入也永遠到不了規定的限度。所以廢除苛捐雜稅的另一個主要方面，便是改善目前的徵收制度（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然而在這官僚豪紳上下結託着的中國農村中間，這比廢除苛雜是件更困難的事情。

中國田賦徵收，到今主要還是依據明朝萬歷年間所編製的冊籍。當時候的土地丈量本來已經不甚精確；此後幾百年間迭遭變亂，所有冊籍頗多散失，或是落入里書冊書們的手中。因此政府要想徵收田賦，便非依靠這些世世傳襲着的土著胥吏——櫃書，里書，冊書，社書等等不可。這些錢穀師爺（徵收人員）大多就是舊時縣衙門的課房出身，自成一派；對上朦蔽，對下欺詐。政府雖然明知他們作惡舞弊，但因冊籍不全，只得去同他們互相勾結，互相掩飾。二十二年農村復興委員會調查江蘇常熟，發現該縣催徵吏有五六百人，多係世襲；但也可以互相買賣，最高價格竟達一千元，普通也非二三百元不能買到。從這一個例子中間，已經可以看出中國田賦徵收的混亂情形了。

最近幾年，政府努力改革田賦徵收制度；取消包收習慣，改由縣政府設櫃徵收。但是因為土地丈量很少成績，所以結果仍然有名無實。例如南開大學二十二年調查河北

省邢台大名等十一縣的田賦徵收，結果知道這些地方事實上還採用各種變相的包收制度。有些縣份開好串票，發給各鄉鄉長代收，鄉長仍舊委託社書辦理；有些縣份改由政務警察負責催徵，而所謂政務警察大多就是社書的變相。浙江省政府在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時所提出的整理田賦計劃案中也說『各縣徵收人員，多係舊日書吏充任；知識既多欠缺，人品亦良莠不齊。其不肖者盤踞舞弊，雖有良法，亦無從施行』。這確是整理田賦的莫大障礙。

徵收制度既然如此腐敗，徵收人員的浮收中飽，自然也就便成爲公開的祕密。南開大學調查河北各縣賦稅，發現這類浮收情形幾乎普遍各縣。例如某縣每兩應徵三元一角，而鄉長向花戶要三元六角；後來終於鬧到縣裏。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也載：『河北省邢台縣第三區張家村，村民與村長因去款起訴一案，結果正款僅一百二十元，而各農戶實納出五百四十八元三角六分五厘之多』。至於報紙記載，那更引不勝引，較爲著名的如蘇州田賦徵收主任朱鈞芳，被人向縣府呈控侵佔國課至五十餘萬元之鉅；縣府對置而不理；於是又向省府呈控。財廳派員調查結果，據云『私自摧收部分，積弊已深；如澈底查究，牽涉各圖經漕及漏稅人在內，約有數百之多，恐將形成大獄』。

當然，田賦徵收制度的混亂，對於一般地主豪紳總是

有利無害的。因為第一，地主豪紳在買賣田地時候，往往勾通里書櫃書，把自己一部份的田賦負擔移在農民身上。因此『有田無糧有糧無田』這種情形，變成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馮德華先生曾在河北省調查一百個地主，發現大部份的地主報縣納稅的畝數，比實有的畝數少得很多。這一百個地主總共有地一，六五七·六八畝，可是報縣納稅的只有八八三·六四畝，僅及實有地畝數的五三·三%。最近江蘇楊山清丈田畝，結果糧田驟然從八千多頃增加到一萬二千多頃；約增二分之一。這四千多頃田地，大部份是地主豪紳們的不完糧的產業。

第二，地主豪紳因為勾結里書櫃書，往往共同舞弊，實行『飛』『灑』；例如把他們的熟田當做荒田，而把農民們的荒田當做熟田。更簡捷的便是拖欠田賦。例如浙江省在最近幾年，各縣滯納田賦已經超過一千萬元。又如江蘇無錫，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四年，已經拖欠田賦一百萬元以上；約佔全部田賦的百分之十。拖欠田賦的人家，全是有勢力的地主豪紳。在他們的眼中看來，能夠拖欠田賦，反而是件有面子的事情。至於一般農民，他們非但無法減輕負擔，而且還要受到浮收勒索等類稅吏們的非法剝削。

在中國鄉村中間，幾乎每種稅捐的徵收，都有多少積弊；田賦不過是最顯著的一種罷了。例如從前徵收厘金，

便無形中有一種『統捐幫』。此外從前的烟酒稅，現在許多地方的牙稅，屠宰稅，甚至營業稅（如山西）都有包稅制度。這些包稅商人，他們的浮收中飽，比較里書櫃書可以說是毫無遜色；至於地主豪紳們的經收差役攤派，自然更是有過之無不及了。記得過去曾有幾位鄉村工作青年來信，他們都說華北農村中的稅捐（包括田賦）問題，比較土地問題更加來得嚴重。這固然忽視了稅捐問題同地主豪紳統治間的密切聯繫；然而在華北，佔着大多數的自耕小農，他們常在各種稅捐重負之下困苦呻吟，這確實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嚴重問題。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中國田賦的徵收孫曉村中國農村（創刊號）
2. 我國田賦的積弊與整理石西民中國農村（第二卷第十一期）
3. 減輕田賦和廢除苛雜莫喬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二集（生活書店出版）

原书空白页

第十一章 農村副業和農民離村

第一節 鄉村手工業的分析

一般說來，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是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所謂『男耕女織』，就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最簡單的寫真。但在封建社會的崩壞時期，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時期，手工業常常比較農業更早踏入商品生產的階段，甚至脫離了農業而獨立發展起來。在農產商品化已經佔有相當優勢的中國，手工業的商品化自然更無問題。所謂自然經濟的家庭工業，僅僅保留在很狹小的範圍以內，而且是在日漸消滅了。

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甚至於在清代末年，這種自然經濟的家庭工業，在中國農村中間還佔着相當的重要地位。農家婦女利用自己的或者買來的棉花，用自己的勞動力把它紡成土紗，織成土布，以供自己消費，這還是很普遍的現象。然而在最近二三十年中間，紡紗工作已經全被大規模的機器生產所侵奪；留下來的織布工作也是絕大

部份已經轉向商品生產。過去農產物的改製，完全是農家自己的工作；現在就連磨粉，軋米，榨油，製糖等等，也被機器生產所逐漸侵奪了。

手工業踏入商品生產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單純的商品生產；這在十九世紀末年已經相當普遍。如在河北『農家從當地購入以副業形式製成的土線，用家族的勞力，以副業的形式織成布疋；直接地或轉入小販之手，銷售於當地或其鄰近市場』。這種生產方式，在交通不便的僻遠鄉村中間，到今仍還相當流行。例如內地農村中間，許多製造農具和家具的手工業者，往往帶着自己的生產物品，送到鄰近的市集或是廟會中去出售。然而一般說來，這種最原始的商品生產，已經不再佔有重要地位；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中間，商業資本已經發揮着它的巨大威力。

手工生產品的交換媒介，從零細交易的小販，過渡到大批收買大量運銷的商號，中間非但是有量的差異，而且還有質的轉變。這就是手工生產者的失去獨立資格，通過了交換過程而隸屬於商業資本。譬如在河北的一個棉織區域定縣，那裏土布的運銷，主要是由十幾家布店所包辦。每逢大小集日，遠近賣布農民都到『布莊』——棉布市場——聚集；同時布店也各派一二個夥友到『布莊』來買布，驗明貨色，講好價錢。等到交易結束，農民把布送到布店

，領取款項。在其它許多棉織區域，商人或用現款收布，或用棉紗去同棉布交換。因為家庭手工業者所用棉紗，一般是由布商供給；所以這兩種制度，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更進一步，家庭手工業者不以出賣生產物的形式，而以出賣勞動力的形式——商人供給原料甚至供給工具，收回製成品而給與工資——去替商人工作。中國鄉村中的織布織綢等類工業，大多已經發展到這一階段。如在河北著名的棉織區域——高陽，一九二九年有布機三萬三千八百架，其中『商人雇主制』的布機佔百分之八十弱。到一九三四年還有布機一萬二千六百架，其中『商人雇主制』的布機佔百分之九二。在浙西許多織綢區域，綢商非但供給原料，而且出租新式織機，因此家庭手工業的出品，往往能同綢廠互相競爭。

從『商人雇主制』轉變到手工工場，相差只有一步而已。但在中國鄉村中間，手工工場制度到今沒有普遍發展，或者在曇花一現以後，便又迅速衰落下去了。按照手工業的一般發展過程看來，跟着商品生產的普遍發展，商業資本逐漸起來控制手工生產；接着再由商業資本轉化而為工業資本。最後這種轉變，提供了機器生產的必要條件；於是手工業便由於自身的發展而跑上沒落的道路。在中國，

手工生產還沒有走盡它的發展過程；機器生產就從海外移植過來；帝國主義廉價商品的侵入，以及國內大規模的機器生產的競爭，都使手工生產未老先衰。這是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特殊命運。

鄉村手工業爲着苟延殘喘起見，常對手工業者施行最殘酷的剝削。勞動時間的延長，往往超過生理上的限度。例如許多布莊(商人雇主)常用獎勵方法，來叫家庭手工業者每天做着十六小時以上的工作。至於勞動報酬的菲薄，有時竟會低到使人不敢相信。如在『換布制度』支配之下，商人往往能用同樣重量的棉紗去換織成的棉布；織工所得，只是靠着漿水的重量，而留下來的少許棉紗而已。

然而這樣艱苦的掙扎，仍然不能挽救手工業者沒落的命運。如在高陽棉織區域，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一年間，棉布產量驟然從三百萬匹降到一百萬匹；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間，布機從三三，八〇〇架降到一二，六〇〇架。鬱林(廣西最大棉織區域)許多大規模的棉織工場，幾乎全在五六年内破產；到今殘存着的大多只是商業資本支配着的家庭手工業者。江蘇南通也是一個著名的棉織工業區域；可是最近三四年間，每年運銷土布竟從八百萬匹降到七十萬匹。棉織工業這樣，其它手工生產大多也是這樣；這也構成了中國農村破產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因。

第二節 農村勞動力的過剩

鄉村手工業的破產，以及其它許多原因，使農村人口的相對的過剩，達到了極嚴重的程度。在資本主義先進各國，農村人口相對的甚至絕對的減少，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般的現象。例如英國的農村人口，一八五一年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九·九，到一九二一年已經只佔百分之一二·七；德國的農村人口，一八七一年佔總人口的六三·九，到一九二五年也只佔百分之三五·八。不過在這些國家中間，農村人口的減少，主要由於都市工業的迅速發展。所以在這裏，農村勞動力非但不會過剩，而且常常感到缺乏；因而刺激着農業生產技術的向前發展。

在中國，農村手工業的破產，它的速度在都市新興工業的發展以上。因此農村中的過剩人口，不能夠在新興都市中間找到充分的出路；他們只得長期地沉澱在壅塞着的農村中間，努力去從狹隘的農場上面尋求生活。民國二十一年國民政府主計處的統計，全國農民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四·五。這種現象，使半封建的零細佃農愈加普遍，佃租愈加苛重起來；同時又使農業勞動者的工資愈加降落，因而阻礙着農業機械甚至耕畜的廣泛利用。在許多內地農村中間，不值錢的人力竟同畜力互相競爭。在這情形之

下，勞動力的浪費，自然走到了很可驚的程度。

然而勞動力的浪費，仍然不會消滅農村中的人口過剩問題。例如嘉興農村調查告訴我們，農業勞動者的人數，平均只佔農家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四·四八（嘉興地方婦女和男子同樣參加田間工作）。自然，經營愈加狹小，勞動力的過剩也就愈加來得顯著。根據同一調查，農業勞動對農家總人數的比率：大經營是五三·八三%，中經營是四五·五四%，小經營是四二·二五%。這就是說，在中小經營中間，有半數以上的人口（中間包括老弱兒童）是從農業中間排擠出來，假定在這中間有半數是不能工作的老弱兒童，那末被排擠的少壯農民也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更可注意的是在這農業勞動者中，還有一半以上的時間不能參加農業工作。農業本來是有季節性的，並不能夠全年工作；尤其因為耕地狹小，工作時間也就愈加縮短。例如無錫農村調查，參加農業工作的壯丁，平均每人每年僅做農業工作一五二日。假使再把各類農戶分別比較，那勞動力的過剩，貧農更比富農來得顯著。根據同一調查，貧農平均每年做農業工作一四八日，中農一五二日，富農一八一。這半年以上的空閒時間，假使沒有其它副業，便得白白地把勞力浪費。當然，這在一般貧農，是個極重大的威脅。

貧農除掉許多時間不能參加農業工作，因而常常陷入半失業的狀態以外；就在農業工作時間，勞動力的浪費，也比富農更加來得顯著。根據無錫農村調查，富農平均每人耕作五·九畝，中農平均每人耕作三·六畝，貧農平均每人耕作三·二畝。又據嘉興農村調查，每一家族勞動單位（壯年男子全年工作）所得到的報酬，大經營是九四·〇九元，中經營是五二·六〇元，小經營是三二·〇一元。如果除去農本所應當得到的利息，和家族勞動所應當得到的普通工資，那末大經營平均每畝要虧本一·五四元，中經營每畝要虧本二·五一元，小經營更每畝虧本四·四五元！

爲了利用過剩的勞動力，爲了彌補農作上的虧損，許多貧苦農民除掉從事上節所說家庭手工業外，便向其它農家副業去找出路。在一般農業國家，畜牧業在農村中間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可是畜牧業在中國（本部各省）却是很不發達。根據去年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牛、馬、驢、騾四種耕畜合計，平均每一農家還是不到一頭；此外羊〇·八頭，豬一頭，雞四·五頭，鴨一頭。除掉耕畜以外，家畜家禽的總值，平均每一農戶只有二十元上下。這種副業，雖然消磨了農家婦女和兒童的許多過剩勞動力；但它對於農村破產的挽救，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在東南各省，養蠶是農村中間極重要的副業。最近幾年，絲價和繭價是在那裏迅速跌落。從民國十八年到二十四年這六年中間，每担鮮繭的價格，從七八十元跌到二十幾元。因此不管蠶種如何改良，養蠶事業仍然跑上了沒落的道路。此外一般農民農閒時期最普遍的副業，便是晒鹽，捕魚，砍柴，割草，趕驢，划船，…以至於到鄰近市集中間去做小販，挑夫等等。總之，凡是可以利用他們過剩勞動力的地方，他們總是盡量利用。然而所有這些副業，它的勞動報酬都是跟着農村破產而在那裏急劇減少；它們對於一般農民，只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罷了！

第三節 農民的離村

農村副業的衰落，和水旱災荒的紛至沓來，逼得幾千百萬中國農民不得不拋棄家鄉，向外去尋生路。中國是個小農經營的國家，小農經營同農村副業可以說是分不開的。農場愈小，對於副業的需要便愈急切；因此副業的衰落，對於他們的打擊也就格外來得嚴重。我們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證明多少農民因為手工業的破產，而從鄉村中間排擠出來；但據馬扎亞爾估計：『在上海紡織工廠之中，現有十二萬工人，利用機器，生產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農民在家庭紡織車旁所生產的紗布數量；所以十二萬農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其次便是華南農民的移殖南洋，和華北農民的流亡東北。民國二十年華僑委員會調查海外華僑，約近一千二百萬人。這些華僑主要來自廣東福建兩省，他們大多用『賣豬仔』的方式去做各種苦工。例如暹羅華僑一百二十萬人中間，苦工佔了百分之九八。民國十九年廣東一省出國的就有五十八萬七千餘人；即全省平均每十戶中間有一人出國。台山梅縣各地農村中間，已經很少壯年男子，一切農業工作幾乎全由婦女担任。

過去東北也是華北離村農民的大收容所。例如民國十六年到十八年那三年中間，山東難民逃亡東北的有七萬餘人；民國十八年河南難民逃亡到黑龍江的也有二萬餘人。大連營口安東遼甯四處，民國十二年到十八年間，入境人數(除去出境人數)約有二百五十萬人。我們看了漢人在滿洲內蒙的都市和農村中間所佔重要地位，也可以知道過去華北農民移殖滿蒙的踴躍情形。然而，跟着世界經濟恐慌的蹂躪南洋，和東北各省的相繼淪亡；華南華北離村農民的兩大出路，快要完全斷絕了。

上述許多出路還不能夠容納中國農村中的過剩人口；許多失業農民因為不能找到適當的職業，於是去做兵士，流氓，土匪，加重社會的混亂和經濟的破產。目下全國兵士人數，大概至少是在二百萬人以上；流氓土匪更充滿着

全國的都市和鄉村。所謂『年年防飢，朝朝防匪』，幾乎已經成爲各地農村中的普遍現象。誰還能夠否認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呢？

中央農業實驗所對離村農民的出路，曾經做了一個較詳細的調查。結果是在全家離村的農戶中間，到城市去做工和謀生的佔百分之三六·七，到城市或別村去逃難的佔百分之二一·九，到別村去種田或開墾的佔百分之二一·八，其它佔百分之一九·六。又在離村的青年男女中間，到城市去做工和謀事的佔百分之四七·八，到別村去做雇農或開墾的佔百分之二八·五，到城市去求學的佔百分之一七·五，其它佔百分之六·二。這個調查統計雖然並不十分完全，但也可以看出離村農民的一般生活情形了。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中國手工業的分析莫喬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二集（生活書店出版）

第十二章 中國農村經濟的新趨勢

第一節 農村經濟的總崩潰

大戰以後，中國的農村經濟，已經隨着帝國主義勢力的深入農村而紛紛破產了。尤其是在民國二十年後，農村經濟更到了總崩潰的階段。從這時起，就連帝國主義，銀行和民族資產階級，以至農村中的地主豪紳，都在那裏高呼農村破產，高倡農村復興。就這一點，已經可以窺見現今農村問題的嚴重程度了！

促成農村經濟總崩潰的基本原因，是帝國主義侵略，地主豪紳們的各種半封建剝削——這在前面各章已詳細分析——而它的導火線便是災荒的蹂躪，和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先就水旱災荒而論：『一九二八年陝甘綏晉豫魯冀察八省大旱，災區五三五縣，災民三千萬人；一九二九年冀省遭水災，陝西續受旱災；一九三一年江淮運河流域大水，災區十六省，災民五千萬，財產損失二十億元；一九三二年又有十一省共三百三十餘縣水災，六省一百三十餘

縣旱災；一九三三年華北大水，區域達十五省二百五十二縣。一九三四年旱災共有十六省三六九縣，水災共有十四省二八三縣。單就旱災而論，各項作物損失已達十四億元。一九三五年也是水旱災荒合流的年份：水災八省二四一縣，災民二千萬人，財產損失七億七千六百萬元；旱災方面，受災面積七千七百萬市畝（水災五千五百萬市畝），損失糧食五千九百萬市担（水災三千五百萬市畝）。根據以上數字推算起來，最近五年水旱災荒中的損失約近一百億元，平均每一農戶損失一百五十元上下！

其次，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也是促使農村經濟總崩潰的一個主要因素。從前僥倖碰到豐年，大多數的農民可以勉強維持飽暖生活。但是一九三〇年後，世界經濟恐慌侵入中國；於是『豐收成災』和『穀賤傷農』的呼聲，更使中國農民陷入萬丈深淵。自從民國二十年起，各種農產價格步步跌落，因此農民們的收入隨着急劇減少。到去年，雖然隨着世界經濟暫時的好轉，稍稍有點起色；但同十九年比較起來，還是相去很遠。現在就把上海一地為例，來看各種農產價格的跌落情形：

上海農產品躉售物價指數(十九年=一〇〇)

年 份	20	21	22	23	24
五 穀	79.76	71.19	54.85	62.14	72.38

紡織原料	101.40	81.48	80.04	74.41	76.80
豆及子仁	108.82	90.37	75.87	60.13	69.78
畜產	102.44	98.03	97.44	87.33	77.33
茶葉	138.46	114.49	86.23	89.97	76.71
煙酒	99.55	102.80	110.10	95.74	101.99
平均	100.30	85.67	77.14	71.85	79.17

自然，上海的躉售價格，同產地收貨商人所出價格還是相差很遠，尤其是在壟斷（例如山東的烟草）和統制收買（例如江浙的蠶繭）的場合，這種差額更加來得顯著。

災荒和恐慌的交織，引起農業生產力的極度衰落。第一便是耕地縮小和荒地增加。例如陝甘等省因為水利破壞，「水田變成旱地或沼澤，旱地則多趨於荒蕪」；因此造成「赤地千里」的淒涼局面。第二，災荒以後耕畜減少，致使許多農家不得不減少耕種面積，或者完全放棄農業，同時人力的代替畜力，也已成爲各地農村中的普遍現象。第三，種子和肥料的缺乏，更使農業生產程度衰落。例如去年湘鄂皖各地春荒嚴重，許多農家因為缺乏種子，完全不能播種。同時肥料的缺乏，迫得許多農家實行最粗放的掠奪耕作，致使地力枯竭，收穫年年減退。例如廣西鬱林每年種稻兩熟，原是很肥沃的地方；近十年來因為無力施肥，收穫平均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過剩，在這全國破產聲中，達到了空前的嚴重程度。第一因為都市工商業的衰落，迫得許多失業工人重返農村。第二，東北的陷落，和南洋華僑的失業回國，堵塞了離村農民的兩條巨大出路。第三，農業的衰落和農村手工業的極度破產，也加重了農村勞動力的過剩現象。各地雇農工資普遍降落；有些地方甚至只求一飽都不可能。例如在河北灤縣『工夫市』中，某姓雇主召請日工兩人，每人每日祇給工資三百文（合六分錢——原來的工資是每日八百文）；結果竟有二十餘人自願半價應僱。（註十四）四川涪陵過去農忙時期僱工十分困難；可是新近產生一種『送工』制度，失業農民一得某家僱工消息，幾十百人擁在門前要求受僱；只求飯食，不計工資，往往弄得雇主無法驅散。（註十五）

在這情勢之下，中國農民們的生活就陷入最悲慘的境地。樹皮草根成了各地貧苦農民們的普通食料；今年春荒聲中，皖西和川北更普遍發生人吃人的慘劇，甚至於把人肉煮湯出賣，（註十三）這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的千萬農民，對於最近『慶祝豐收』的煌煌法令，大概只好含淚慘笑了

（註十四）詳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報會員通訊

（註十五）詳見中國農村二卷四期四川涪陵西南鄉的送工業播

（註十六）詳見中國農村二卷八期請看中國的烏拉爾

吧？

第二節 銀行資本的輸入農村

跟着農村破產和農村復興運動的開展，銀行資本的輸入農村，也逐漸成爲一個引人注意的巨大潮流。最近四五年來，由於農村資金的向都市集中，以及工商業的的蕭條，各大銀行中的過剩資金，不容易在都市中間找到出路。於是聰明的銀行老闆，便把他們銳利的目光，轉向破碎的農村中去。自從一九三二年後，上海各大銀行便在『救濟農民』和『復興農村』的鮮明旗幟之下，紛紛舉辦農村貸款事業。去年幣制改革以後，各銀行的農村貸款更見活躍；而最近『農本局』的成立，便已表示浩浩蕩蕩的『資金下鄉』運動，正在踏上一個更廣泛的階段。

農村投資雖然只有短短四五年的歷史，但是已引起全國改良主義者的巨大幻想。他們以爲有這巨大資金流入農村，農業生產便會迅速發展，早已枯涸了的中國農村，便會因此繁榮起來；更有若干學者（例如中國地政學會）希望靠着銀行貸款來解決中國農村中的土地問題。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在現狀之下，要靠銀行投資來復興中國農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爲什麼呢？因爲第一，中國的銀行帶着很濃厚的高利

貸的性質；各銀行的存款利息，普通高至月息七厘八厘，甚至一分上下。這樣收進來的存款，自然只能去做地產公債，標金等類利息豐厚的投機事業，決不能夠用來擴張工業生產，更不能夠用來發展農業。而且農村放款手續繁多；銀行貸款雖然只收月息一分（廣西等省要收月息一分五厘）加上種種開支就會高到一分幾厘，甚至二分以上。用這樣的高利貸款來投資農業生產，不要說獲利，恐怕連夠本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銀行放款要求安全，他們因為工商業的投資危險太大，所以轉向農村。然而在這農村破產時候，農業放款會比工商放款來得安全，這是誰都不敢相信。所以目下所謂農村放款，不是用於農產運銷，便是用於農產抵押，祇造成了許多新式的商號和當舖；或者更進一步，採用『穩紮穩打』的辦法，把這貸款放給地主富農，讓他們去贏利生息。總之，這種貸款決不會變成生產資本，只會變成高利貸和商業資本。

至於希望銀行貸款來幫助貧苦農民購買土地，那更是個金黃色的幻想。我們姑且不論貧苦農民是否有資格來接受這種銀行貸款（按照各國——蘇聯除外——情形，貧苦農民因為『信用』不足，沒有資格接受銀行資本家的『救濟』）；縱使可能，利用這種高利貸款來購買價格昂貴的土地

，也仍不免得不償失。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中國農民每年所納佃租，錢租約佔地價的一一·〇%，穀租約佔地價的一二·九%，分租約佔地價的一四·一%。所以佃租雖重，如同月息一分(年息一分二厘)比較，已經相差不遠。何況第一，農民借款購地以後，還要負擔田賦一項巨大損失；而且第二，遇到水旱災荒，以前的佃租可以減讓，現在的銀行利息却非照納不可。所以銀行老闆縱使願意大發慈悲，冒着險來『救濟』貧苦農民；多數農民還是沒有興味來爭取這個『耕者有其田』的『光榮』頭銜的。

那末銀行資本的輸入農村，對於農村經濟是否毫無影響呢？那也不然。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間，銀行資本的輸入農村，縱然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但仍可以打擊農村中的殘餘封建勢力——農村商人和高利貸者；使都市資本更有力量地統制農業生產。在中國農村中間，農村經濟的極度衰落，即多數農民的由貧困而至於破產，已使建築在農民經濟上的一大部份地主豪紳跟着沒落，他們失掉了復興農村的力量和自信。同時帝國主義者和民族資產階級，也感到農村中的地主豪紳已經無力支持危局，他們必須親自『下鄉』。然而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兩重束縛，以及災荒和經濟恐慌的侵襲，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沒有發展的可能。因此銀行資本不但不能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

恰恰相反，他們是在扶植農村中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或者本身轉化而為高利貸和商業資本。

在這轉變過程之中，一部份的地主豪紳仍在沒落中間掙扎；但是另一部份得着銀行資本家的『輸血』，把他們的地位從新鞏固起來。所以一般而論，大部份的地主豪紳對於銀行家的農村投資非但不加反對，而且表示歡迎。當然，在這各地農民土地鬪爭的浪潮中間，都市資本家和地主豪紳們的密切合作，是有很重大的政治意義；它使勞動者的農村改造，和地主資本家的農村復興運動，形成一個很鮮明的對立。

銀行資本不但勾結地主豪紳，同時又同帝國主義發生很密切的聯繫。很顯明的，各銀行的農村投資，既然可以幫助民族資本家去爭取原料和農村市場，同時也可以幫助帝國主義者來更強固地控制中國農民。例如上海各銀行在山東省的農村放款，就曾幫助英美烟公司去控制烟草生產，和推行××帝國主義者的棉花政策。尤其在這『中×經濟提攜』聲中，誰能保證這些農民們的『救主』，不一變而為××帝國主義『開發』中國農村的拓荒者呢？

第三節 中國農村的殖民地化

除掉銀行資本之外，帝國主義列強也在中國的農村破

產中，盡力鞏固它們的統制力量。最近五六年來，帝國主義列強一面因為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威脅，不得不加緊掠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衆；廣大的中國農村便是它們一個最重要的對象。然而另一方面，中國農業生產的極度衰落，和中國農民購買力的喪失，使它們的侵略政策受到很嚴重的打擊。因此他們覺得應當親自跑到中國農村中來，推行他們各人心目中的『復興』政策。近來大吹大擂着的所謂『國聯技術合作』，雖然因受××帝國主義者的反對，沒有多大成績；但也可以看出歐美資本家的『深謀遠慮』了！

自從『九一八』後，××帝國主義者的軍事，政治，經濟勢力，已像潮水般地衝入中國農村。現在東北四省早已變成十足的殖民地了，華北各省也向殖民地的道路節節推進。由於這種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勝利，××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民們的侵略便也踏上一個新的階段。

誰都知道，××在帝國主義列強中間是個後進國家，它的經濟基礎遠比英美各國來得薄弱。所以他們明白知道，如果維持着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運用資本的力量去同英美帝國主義自由競爭，他們必然站在失敗地位；他們只得憑藉武力，攫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越地位，方才能夠滿足他們的侵略野心。於是他們使用飛機大砲來『開發』中國農村，強迫中國承認『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所謂『中

日經濟提攜」政策。這種殖民地的侵略方式，可以用下列幾種事實更具體地表現出來：

首先，××帝國主義因為缺乏紡織原料，它要華北農民替它種植棉花。那末他們是否採用一般資本家的正常手段，即提高棉花價格，來獎勵華北農民擴充棉田呢？並不這樣！他們威脅中國官廳，要它強迫中國農民種植棉花。例如北平晨報曾載山西建設廳決定『自今年起，全省強迫種棉，不種即問罪』。接着各報登載閻百川先生的『告山西各縣人民趕快種棉書』；宣稱政府已經『規定保賠試種的辦法：種棉收成好了，不僅自己得利，同時政府還要從優獎勵；即或收成比不上種普通糧食，政府還要賠償損失』。在傀儡政府統治之下，自然更加雷厲風行。例如立報記載，『爲冀東自治政府近派軍隊，在通縣四郊強迫農民栽種棉花，以應日本需要；又向日外省及滿鐵會社請求派員指導』。這同殖民地政府還有什麼區別呢！

其次，××帝國主義者的控制農產市場，也採取着特殊的方式。他們並不利用巨大資金，去摧毀中小商人和其它帝國主義者的競爭；却也利用政治勢力，實施貿易統制政策。在東北，各種農產——從棉花，菸草，大豆到米麥糧食都在統制之列，強迫農民用掠奪般的低廉價格賣給日本資本家的壟斷組織——滿洲棉花公司，滿洲菸草公司等

等。自從統制政策實施以後，東北農民們的收入大大減少。例如一公頃的收入，在一九二九——三〇年有一百二十二元哈洋，到一九三三——三四年只有五十七元滿洋了。這些壟斷公司非但獨佔農產市場，而且利用它們所得獨佔地位，實行高利貸的剝削；如在秋收以後廉價收買糧食，到了春荒時期高價出售。

在華北，他們雖然還不能夠公然實施統制政策，但已通過興中公司，以及農村合作機關等等，（例如冀魯等省植棉事業，多為日商投資）獨佔幾種最重要的農產市場。最近報載『冀魯兩省棉花豐收，借乎遭受日商控制，華商無法前往購辦』。因此河北省的棉花幾乎全被日商收買，山東省的棉花也被日商收買半數以上。當然，這種舉動，非但影響着中國的農村經濟，而且威脅中國的民族紡織工業。

最後，××帝國主義者在東北的土地掠奪，更是對付殖民地的最野蠻的掠奪方式。自從一九三二年起，日本便在黑龍江省的通河流域，吉林省的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流域，遼寧省的遼河下游和鴨綠江流域等土地最肥沃的區域，逐漸推行移民政策；沒收農民們的肥沃田地。尤其是在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和附近許多地方，因為屢次沒收民田，迫着一村村的農民繳照出境，曾經引起大規模的農民暴

動。安東的農民，也被迫着以時價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把土地賣給日本人，讓朝鮮人去耕種。除掉土地掠奪之外，東北農民還被迫着去築路和運輸軍需——爲着鐵壓各地農民暴動——並負擔各種苛重的稅捐；這使許多農民們的生活陷於絕境。

這樣看來，中國的農村經濟，正從半殖民地向着殖民地的道路發展；這種趨勢，跟着領土和主權的喪失；從東北而華北，從華北而華中華南，正在節節推進之中。我們要用什麼力量，來阻止這種最野蠻的侵略政策呢？

第十三章 農村合作運動和農產統制

第一節 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特質

因為農村破產日益深刻，所以最近四五年來，一方面有貧苦農民們的抗租，分糧，以及更嚴厲的土地鬥爭；另一方面，地主資本家的農村復興運動也在一天天地發展起來。在這復興運動中間，最被博士教授們稱頌着的，恐怕要算農村合作運動。去年三月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在謁陵昭告文中，曾說：『深維救國急務，首在復興農村；然非改善經濟組織，無以謀農村之復興；非推行合作事業，無以謀經濟之改善』。從這短短一段『合作救國』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合作事業的如何被人重視了。

合作運動所以能夠如此被人推崇，不但因為它有一套炫人耳目的巧妙理論；而且因為它在最近幾年，確乎是在那裏迅速發展。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最近統計，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四年這七年中間，合作社數增加二十八倍，社員人數增加三十七倍；尤其是在民國二十年後，更加來

得顯著：

年份	合作社數	指數	社員人數	指數
20	3,487	371	(5,43)	242
21	3,978	427	151,252	560
22	6,431	682	137,631	10
23	14,499	1850	557,521	2065
24	26,224	2811	1,094,401	3720

註：指數以十七年爲一〇〇

因爲合作社的發展如此迅速（實際這些數字就是正確，也不能算十分巨大；例如廿四年的社員人數幾乎只佔全國總人數的千分之二，或佔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一），所以許多知識份子對它抱着種種幻想。他們以爲只要辦了信用合作社，一般貧苦農民就能夠獲得充分的資金來購買土地和農業機械；只要辦了運銷合作社，農產市場就不會受商人以至帝國主義者所操縱；只要辦了生產合作社，許多半封建的小農經營就會自動聯合起來，變成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這樣就能改善經濟組織，挽救農村破產，甚至可以不經鬥爭，不經革命，和平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是事實告訴我們，這種烏托邦的幻想，只是博士教授們的虛偽宣傳而已。

只要稍有社會科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所謂合作組織

，並不是一種特別的社會制度，也不一定代表或排斥某種生產方式。合作組織可以存在於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社會中間，也可以存在於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社會中間；而且隨着它所處的社會環境各異，它所盡的任務也便大不相同。譬如在蘇聯，合作組織是社會主義經濟克服小生產的一個有力工具，它是計劃經濟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在蘇聯，合作運動爲什麼能夠把孤立的小農經營組織起來，成爲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呢？主要因爲：第一，他們早已廢除土地私有制度，地主同農民之間的對立已經完全消滅。第二，他們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扶助和領導之下，不是爲着發展或者維持資本主義，而是爲着消滅資本主義。第三，他們是有勞動者的政權來做後盾，必要時候可以用政治的力量來壓迫富農——鄉村中的資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間，合作運動一般是在金融資本家的領導之下，靠他們的扶助發展起來。自然，這種合作組織決不能夠消滅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是資本主義控制小生產的一個有力工具。因爲第一，它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指導他們有計劃地供給原料，成爲工業資本家的外行。第二，它用都市資金來扶助地主富農經營，使農業生產本身也向着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不過在這裏，由於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金融資本家的追求利潤，不願意把資

金供給貧苦農民；所以一般合作主義者所期望着的農業生產合作(集體農場)，決不能夠廣泛發展。

在中國這樣半封建的農村中間，合作運動非但不能創造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甚至不能發展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在中國，合作運動的發展，並不會使貧苦農民解除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束縛，也不會使他們有力量來對抗鄉村中的地主豪紳；它的主要作用只使買辦性的銀行資本深入農村，加強他們對於農民們的控制力量。『所以，今日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發展，其前途祇是進一步的掃蕩地方經濟的殘餘，使各地農業加深其商品化的性質，最後使中國的農村經濟更趨向於殖民地化而已』。

第二節 農村合作組織的分析

爲着充分明瞭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特殊性質起見，我們要對這些合作組織再做一番較詳細的分析。首先，從合作社的地域分佈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農村合作運動並非出於農民們的自動要求，而是幾種上層勢力競向農村發展所造成的結果。在這上層勢力中間，第一是帝國主義者和民族資本家的追求廉價原料；所以河北陝西兩省植棉區域，成爲合作運動最發展的地方(河北合作社數最多，陝西社員人數最多)。第二是銀行家的開闢投資道路；這從

多數合作社的集中於鄰近金融中心的江浙冀魯各省可以充分證明。第三是政府的企圖用這『和平建設』來消滅農民們的土地鬥爭；因此江西安徽等地『剿匪』區域，合作運動也比其它各省來得發達。我們不難從此瞭解，所謂農村合作運動，它的實際意義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了。

其次，從合作社的種類及其發展趨勢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合作組織所負擔的任務。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最近四年中間各類合作社的百分數如下：

	21年	22年	23年	24年
信用	80,1	82,3	59,5	58,9
運銷	1,3	0,9	8,8	8,7
購買	2,0	1,9	3,5	2,8
利用	4,8	0,5	3,6	4,1
生產	7,4	4,4	10,8	8,9
兼營	—	—	13,8	15,7
其它	4,4	10,0	—	—

上列數字告訴我們：第一，信用合作所佔比率雖然顯著減少，但是它在各類合作組織中間還佔絕對多數。當然，這些合作社是銀行資本在各地農村中的最下層的根鬚，同時也是高利貸的一種新式機關。許多信用合作社的放款常被地主富農們所獨占；往往通過他們，再用更加高的利

息借給貧苦農民。還有許多地方，農民所借到的放款，未到手時便被扣去抵償佃租利息，或者抵償田賦稅捐。根據各地報告，我們相信所謂信用合作社的極大部份，是同合作主義背道而馳的。

第二，運銷合作在最近幾年中間發展特別迅速（這裏應當注意，所謂兼營合作，大多也是信用合作和運銷合作的混合組織），這可表示合作運動正在逐漸控制農產物的交換過程；這在陝西植棉區域更加來得顯著。不過這裏所謂運銷合作，實際只是帝國主義者和銀行資本家的收貨機關。近幾年來因為農產價格低落，農民對於合作社已完全失去信仰；所以陝西許多運銷合作社改用『抄莊』辦法，即由合作社用現金向社員收買棉花，每擔徵收一塊錢的佣金。或者採用預買『期花』以及抵押等類辦法，完全承襲舊式商人所行使的高利貸的交換方式。

第三，生產合作和同生產合作較有聯繫的利用購買兩種合作組織都不能夠順利發展。生產合作表面雖然佔了相當大的比率，實際僅只限於手工業等不重要的經濟部門而已。

更次，我們要看農村合作社同地主豪紳們的聯繫。前面說過，中國農村中的合作組織，幾乎全被地主富農們所操縱；各地合作社的入社資格和放款保證，顯然會把大部

份的貧苦農民關在門外。例如第一，中國銀行在河北所指導的運銷合作社，限定有二十畝棉田的得入一股，四十畝的得入二股；江浙各地合作社的信用放款，大多要把土地或者耕牛來做保證。這使大部份的貧苦農民喪失入社或者借款資格。第二，各地信用合作社員，普通都要連環保證；因此地主富農爲着避免被人拖累起見，常常藉口『缺乏信用』，拒絕貧苦農民入社。第三，江蘇農民銀行（其它各地大多如此）所發信用放款，除掉上述保證之外，還把地主或是鄉長村長們的保證當作必要條件，這更加强地主豪紳對於貧苦農民們的控制力量。總之，銀行家的放款安全，同貧苦農民們的借款便利是背道而馳的；爲着保證銀行家的豐厚利潤，自然只能犧牲貧苦農民。

由於上述原因，各地農村合作組織大多僅有合作之名，毫無合作之實。據浙江官廳調查，全省合作組織有百分之四七，是被多數或少數特殊階級所利用；據同一調查，合作社中完全不懂什麼叫做『合作』的佔百分之五三，一知半解的佔百分之三七；所以全省放績的結果，不滿六十分的合作社佔總社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浙江如此，其它各省更可想而知了。

最後，農村合作社同帝國主義間的關係如何，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方面，我們雖然不能找

出許多統計來做研究資料；但也不難從各種事實中間，來獲得若干間接的證明。例如在幾佔全國合作社數四分之一的河北，大部份的合作組織集中在西河植棉區域；這裏所產棉花幾乎全被××帝國主義者所收買。山東種菸區域的合作組織也很發展；而這菸草市場是被英美煙公司所獨占的。尤其是在最近『中日經濟提攜』聲中，××帝國主義已把推行合作事業當做『開發』華北農村的一件重要工作。同時許多英美御用學者，也把合作組織當做『國際技術合作』之一基本方式。從這幾點，我們已經不難看到中國農村合作運動的前途了。

第三節 農產統制的實際意義

除掉農村合作之外，農產統制也是現今中國農村復興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政策。農產統制雖然只有三四年的歷史，而且到今仍被大多數的自由主義學者和中小資本家所反對；但是由於政府和資本巨頭們的獎勵督促，最近兩三年來已在各地着着推行。例如江浙兩省的蠶繭統制，皖贛兩省的紅茶統制，廣東省的糖業統制，和最近河南省的菸草統制，都是很顯著的例子。

近來雖然也有若干御用學者，宣稱農產統制政策一面可以抵抗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一面可以解除中間商人

們的封建剝削；這樣可以改善農民生活，復興農村經濟。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美滿理想，只是他們招搖撞騙的幌子而已。凡是洞察真相的人，恐怕都會承認：帝國主義是農產統制的後盾，買辦化的銀行巨頭和工商巨頭是農產統制的靈魂，一部份的地主豪紳充當農產統制的僕役，而全體貧苦農民却做了農產統制的犧牲！

爲什麼我們說帝國主義是農產統制的後盾呢？因爲中國所謂農產統制，事實上是把帝國主義者的收買農產來做基礎的。誰都知道，絲茶兩項是中國輸出農產中的主要項目；所以農產統制的首先在蠶繭和茶葉兩個部門實施（所謂糧食統制到今還是有名無實），決不是件偶然的事情。很顯明的，蠶繭和茶葉的統制，非但沒有提高中國絲茶商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甚至沒有動搖外商在中國市場上的壟斷權力。生絲的出口，到今仍由外商包辦；紅茶統制實施時候，運銷處（統制機關）的負責人也在『外商會議』席上正式聲明『紅茶外銷先與外商交易，不擬自己運出國外』。至於菸草統制，更明白規定商股分配『華洋各半』（這裏所謂『華商』自然主要就是英美煙公司的買辦）；事實上是等於幫助英美煙公司來壟斷河南省的菸草市場。我們很可預料，華北所產棉花，不久也會在××帝國主義者的『指導』之下實行統制；到那時候，我們更容易看出所謂統制貿易

的真面目了。

爲什麼我們說銀行巨頭和工商巨頭是農產統制的靈魂呢？因爲他們是農產統制事實上的主持者；政府所設統制機關，實際只是他們的代理人罷了。例如浙江省的舉辦絲繭統制，全靠上海各銀行的放款來做後盾；銀行安享着豐厚的放款利息，而政府却負擔着投資的危險。江蘇絲繭中心——無錫的蠶種統制和烘繭統制，幾乎全由絲業巨頭薛壽萱一手包辦。薛氏所組織的興業公司非但承租全縣絲廠，而且壟斷着宜興溧陽等縣各地的繭行。去年絲價上漲，浙江省的絲繭統制委員會僅得純利十餘萬元（自然已經付了極巨大的銀行利息）；而薛壽萱氏一個人的純利却在二百萬元以上。皖贛紅茶統制也不過是用銀行放款來代替上海各茶棧的放款；所謂運銷處——統制機關——實際只是各銀行同各茶號之間的放款介紹人而已。

至於各地農村商人，雖然很多受着統制政策的打擊——例如河南的菸商和江浙兩省一部份的繭商——但是有些勢力比較大的地主豪紳，也能夠在統制政策的卵翼之下，把他們的勢力更加擴大。例如無錫實施烘繭統制以後，同薛氏有關係的地主豪紳得到蠶絲改良會的特許，取得壟佔資格（後來因受其他繭商——自然也是地主豪紳——威脅，暫時取消烘繭統制）。皖贛紅茶統制用銀行的低利放

款來替茶棧的高利放款，這使產地茶號可以少受一點剝削，可是對於茶號的剝削茶農，却未給以絲毫限制。同時以前的茶棧經理，現在也被聘請來做運銷處的紅茶推銷主任等等。總之，只要你能贊助統制政策，資本家同地主豪紳間的利益是不難調和的。

最後我們要問，農村勞動大眾從這農產統制政策中間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他們所得到的是更苛重的剝削！例如前年浙江統制收繭，非但沒有阻止繭價跌落，反把繭價抑到江蘇省的平均繭價以下。浙江蠶農不願虧本出售，自己繅絲；政府又派大批軍警下鄉禁止。今年絲價上漲，絲商大獲贏利；可是江蘇蠶絲改良會所定繭價，仍在蠶農們的成本以下。而且因為統制烘繭，蠶農不能自烘乾繭等待善價；只得在任何條件之下，把他們的鮮繭忍痛出售。皖贛統制紅茶以後，茶號非但不能提高茶價，反利用着茶棧停止放款的糾紛，加緊他們對於茶農的剝削。最近河南統制菸草，據說目的是爲『杜絕私捲（手工製煙），充裕國稅』。因此英美烟公司非但可以抑低菸草價格，而且可以『杜絕』手工捲煙業者對他們的競爭。同樣，廣東實行糖業統制以後，禁止農民手工製糖（製糖是廣東農民很重要的副業）。據說在省糖供不應求的時候，竟用洋糖冒充省糖出售，對於禁製土糖仍不絲毫放鬆。

本來，統制經濟同計劃經濟不同之點，就在後者的目的是在提高勞動大眾們的物質生活，而前者的目的則在保障壟斷資本家的豐厚利潤。在中國，儘管有人有意把這兩者混爲一物，可是統制經濟的特質，決不因此絲毫變更。所以我們相信，如果我們不能阻止整個國民經濟的殖民地化，那末無論農產統制或者農村合作運動，它們的唯一結果，只是幫助帝國主義者和買辦化的資本巨頭們來控制農業生產，加重他們對於農民們的剝削，並使中國農村愈益殖民地化。這該不是憑空杜撰的結論吧？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中國合作運動之批判李紫翔中國鄉村建設批判
2. 近年來中國的合作事業狄超白中國農村(第三卷第二期)

第十四章 知識份子的鄉村改良運動

第一節 鄉村改良運動的來源

正像俄國解放農奴後的『民粹主義』運動那樣，中國知識份子的鄉村改良運動，也跟着地主資產階級的農村復興運動而在那裏蓬勃發展起來。鄉村改良運動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民國初年，例如山西省的『村治』；然而它的泛濫全國，却是七八年來國民革命運動消沉後的事情。誠如鄉村建設大師梁漱溟先生所說：『我提出『鄉治』的主張，是民國十七年的事；而主張之前後貫通，完全成熟，則近三年間事也』（這話是在民國二十三年寫的）。儘管梁先生把這件事情歸結到個人的思想上的變遷；但是誰都不能否認，鄉村建設之與農村復興運動同時興起，決不是件偶然的事情。

目下中國的鄉村改良運動快要普及全國；不過派別紛歧，還沒有產生一個堅強的中心領導機關。在這派別中間，比較著名的如梁漱溟先生所領導的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

，晏陽初先生所領導的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高踐四先生所主持的無錫教育學院，以至鎮平內鄉析川三縣的民團，江寧蘭谿兩個實驗縣，中華職業教育社和幾個教會學校（燕大金大）所舉辦的鄉村改進工作等等。這些集團儘管他們的理論不同，方法各異；可是他們的來源和基本精神却仍大致相同。梁先生在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中曾經指出：『我們到會同人各從不同的動機，不期而然地集於鄉村運動一途，好多為始意所不及料。……四面八方來到一塊，這證明今日鄉村運動，好像是天安排下的，非出偶然』。這當然是有客觀的原因的。

所謂客觀原因究竟是什麼呢？第一，這時候的地主資產階級為着鞏固自己的地位，要用鄉村改良來消滅貧苦農民們的土地鬥爭。梁先生說：『鄉村建設運動實為一種農民運動，或造端於農民運動……所不同於過去之農民運動者，蓋在不分化鄉村，而視鄉村為整個的；不鬥爭破壞而合作建設』。這裏可以看到所謂鄉村建設運動，它是跟着農民運動而產生的；不過它的本身並不就是一種農民運動，而是同農民運動正相對立。因為過去的農民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運動；而現今的鄉村建設或者鄉村改良運動，却要求農民去同地主豪紳以至帝國主義合作，接受了後者的領導來『改革社會』，『建設農村』。

第二，這時候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不敢反抗帝國主義，所以在都市中間，他們的經濟勢力不足以與帝國主義者相抗衡；只得改用躲避政策，到鄉村中去尋找出路。梁先生說：『所謂中國建設必走鄉村建設之路者，即謂必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之路；換言之，即必從復興農村入手』。『內地農村能利用外埠過剩資金以恢復生產，增進生產，因而增進一般購買力以促興民族工業，而後工業乃至一切產業以次可興』。誰都容易看出，梁先生這套鄉村建設理論，是同都市資本家的農村復興政策心心相印的。所可惜的只是民族資產階級既能退到農村中去，帝國主義也會追到農村裏來。結果所謂『引發工業』，只是『引發』了帝國主義者的工業；然而這在一般鄉村改良運動者是不大計較的。

第二節 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梁先生的鄉村建設非但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而且還有他的特別的哲學基礎。梁先生把世界文化分成三類：第一是『改造客觀環境以解決問題』的西洋文化；第二是『調和融洽於我與對方之間』的『中庸』文化或者中國文化；第三是以『取消問題為問題之解決』的印度文化。據說印度文化是最進步的，西洋文化是最落後的；中國文化雖然落在印度後面。

但已跑在西洋前面。所以盼望中國去學民主政治，去行資本主義，據梁先生看來，都是開倒車的行爲。

那末所謂『中庸之道』的中國文化，它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梁先生告訴我們，中國是個『倫理本位和職業分立的社會』。西洋社會是把個人來做本位，個人直接隸屬國家；中國却把家庭來做社會組織的骨幹，用『家庭情誼』來代替個人同國家之間的法律關係。在中國社會上沒有『貴族與奴隸階級的對立』，沒有『資本家與勞工階級的對立』；『生產工具無爲一部份人壟斷之形勢，殆人人得而有之，以自行其生產』。可惜這時中國的『社會組織根本崩潰，法制禮俗悉被否認』；所以目下鄉村建設的任務，便在恢復『法制禮俗』，維持『社會秩序』。

首先我們來看什麼叫做『倫理本位』。凡是稍有社會科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梁先生的『倫理本位社會』，原來就是封建時代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因爲自然經濟佔着優勢；所以家庭不但是個消費單位，而且是個生產單位。無論農業或者手藝工業，都在家庭範圍之內進行。家庭因爲做了生產上的重要基礎，因此便被一般人所特別重視；這樣構成了宗法社會或者『倫理本位社會』。可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已在家庭之外進行；父子兄弟各有各的職業，甚至飲食起居都須各自料理。這時家庭已經失却生產上的

重要地位，於是逐漸分解，同時宗法社會中的『法制禮俗』，也便被人『否認』了。

現在中國雖然還不能夠說是一個成熟了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自然主義經濟顯然已被破壞，所以宗法家庭早已跑上了沒落的道路，這在商品經濟最發展的都市中間更加來得顯著。這時候來恢復『倫理本位』，無異乎把中國推回自給自足的封建時代；這自然是件不合理而且不可能的事情。這裏我們看到梁先生把封建的『中庸文化』，當做比資本主義的『西洋文化』更進步的東西，實在是違反歷史事實的錯誤觀念。

其次，中國是否果真是個『職業分立』社會呢？顯然不是。在都市中間，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資本家同勞動者的對立；在鄉村中間，我們也可以看到地主同貧苦農民的對立。而且生產工具——尤其是土地早被『一部份人壟斷』，並不能夠『人人得而有之』。這些千真萬確的事實，除掉梁先生等『有心人』外恐怕誰都不能否認。所以當前的問題，是在怎樣認識——進而解決這些『對立』；並不是在掩飾這些『對立』。然而梁先生的『法制禮俗』，顯然只能掩飾這些對立；對於解決這些對立是絲毫沒有幫助的。

在不平等的社會中間，任何否認對立提倡合作的學說，儘管它的面貌如何公正仁愛，結果總是做了剝削者的護

；梁先生的鄉村建設自然不是例外。試看鄉村建設在鄒平的實施情形；這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梁先生用來『推進社會，組織鄉村』的鄉農學校。鄉農學校分為鄉學村學兩種；鄉學相當於普通的區公所，村學相當於普通的鄉公所；不過它們兼負着教育農民，和倡導社會改良運動（例如禁煙禁賭）的責任。鄉農學校的構成份子，是鄉村領袖，成年農民，和鄉村運動者。先由鄉村中『有資望有信用的領袖』組織學董會；再由學董會推舉『齒德並茂』的人，經縣政府禮聘為學長，主持教育。縣政府再在學董中委一人為理事，負『辦公事』的責任。此外還有縣政府所委派的輔導員和教師；他們大多就是鄉村運動者。至於一般農民，便是他們教育的對象，稱為『學衆』。

誰都知道，中國鄉村中間所謂『有資望有信用的領袖』，大多就是地主豪紳；尤其是『齒德並茂』的領袖，一定更是地主豪紳中的保守份子。這些領袖，請他們來提倡『法制禮俗』或者比較適宜；可是請他們來『推進社會，組織鄉村』，顯然只是幻想。梁先生勸一般農民——學衆——尊敬學長，信任理事；換句話說，就是叫他們去服從地主豪紳。所以梁先生的鄉農學校，除掉用『軟功夫』來代替『硬功夫』這一點外，同其它各地的保甲制度是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的。

當然，單用軟功夫來維持農村社會秩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鄒平除掉鄉農學校之外，還有一種類似民團的組織，叫做『連莊會員』。梁先生憂慮『鄉民愚迷而有組織，且為武裝組織，其危險實大』。所以他主張訓練『有家財產』的人來做連莊會員，代替『愚迷鄉民』們的武裝組織，這樣可以免得『為人利用，釀出禍亂』。從這點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梁先生的『維持社會秩序』，究竟是在保障什麼人的利益了。

第三節 定縣的平教實驗運動

假使鄒平的鄉村建設是復古運動，那末定縣的平教實驗更可說是維新運動。定縣的鄉村工作名義上面雖然只是實驗平民教育；可是它的終極目標却是『農村建設』，『民族自救』。他們以為我國近八十年來發生過五次自救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軍北伐；不過沒有達到民族自救的目的。所以第六次的農村運動不僅要繼承前五次的自救運動，並且還要補足前五次運動的『缺陷』；這缺陷就是『大多數人的教育問題』（孫伏園先生全國各地的實驗運動）。因此定縣的平民教育實驗工作，便成為『第六次自救運動』的發軔。

晏陽初先生根據多年工作所得到的經驗，發現中國農

民是有四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愚』『窮』『私』『弱』四個大字。爲着解決這四個基本問題，他們用『文藝教育』以救農民之『愚』，用『生計教育』以救農民之『窮』，用『衛生教育』以救農民之『弱』，用『公民教育』以救農民之『私』；這就是所謂『四大教育』。實施這四種教育的方式又有『社會式』，『學校式』，『家庭式』，這就是所謂『三大方式』。他們認爲四個『基本問題』是中國農民的病根，『四大教育』是治病的藥方，『三大教育』是下藥的方法。假使藥到病除，那末他們就能『使農村復興得到具體進行的方案，使國家得一條基本建設的新路，使中華民族能于建設之中，創造一個新的生命』了。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晏先生所發現的『愚窮弱私』，實際只是中國農村問題的表面現象，並不真是中國農村中的『基本問題』。首先我們看到就在『愚窮弱私』四個大『病根』中間，『窮』病可以說是其它三種病的『病根』。中國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窮』到無法維持生活，他們自然沒有力量享受教育，講求衛生，也不會像晏先生那樣每年化費幾十萬塊錢來『熱心公益』了。更進一步，中國農民爲什麼會『窮』呢？自然還有更『基本』的原因。根據前面各章研究，我們知道最『基本』的問題，乃是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和地主豪紳們的封建剝削。晏先生把這些真正的基本問題攔着不

談，却在若干表面現象上面去找出路，這樣怎能不做『頭
『醫頭，脚痛醫脚』的庸醫呢？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定縣的實驗工作絲毫沒有成就，
在若干技術方面，他們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因為他
們忽視農村經濟的基本問題，枝枝節節地求解決，所以他
們所得到的技術上的成就，並不能夠達到『農村建設』，
『民族自救』的目的。譬如在生計教育方面，他們改良作物
和家畜家禽的品種，確有相當成效。然而這是否能夠『救
農民之窮』，使定縣的農村經濟免於破產呢？完全不能。
本教會的調查主任李景漢先生告訴我們這些事實：

民國二十二年冬季，定縣人民常常起鹽也吃不起的約佔人口總數
百分之二十。

前五年時定縣的乞丐是鳳毛麟角，上年冬季增至三千左右。

民國二十年內，在定縣因債務破產，而為債主沒收一切家產之家
數，不過五十左右，二十一年內增至三百家左右，二十二年內竟達二
千家之多。

目下定縣欠債之家數，佔全縣總家數百分之六十七，約四萬六千
家。……月息普通為百分之二·五，有高至百分之五者。

自民國十三年至民國二十年，每年出外謀生的至少四百餘人，至
多一千五百餘人，民國二十一年增至三千三百六十七人；而民國二十
二年內竟達七千八百餘人之多。

這樣看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驗工作並不能夠解決農村問題，不但定縣如此，其它各地也是這樣。如錫教育學院辦理黃巷實驗區（黃巷的實驗工作同定縣的實驗工作大同小異），不知費掉多少心血。可是甘導伯先生根據工作三年所得到的經驗告訴我們：「黃巷民衆最需要的爲耕地，爲工作，而耕地無多，地權不屬，絲廠倒閉，繭價慘落。同人聽黃巷民衆哀痛的呼聲，只覺心餘力絀。所謂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祇是將頹垣敗壁，略加修補，並非根本改造」。又說，「豪紳是民衆的桎梏，小民的生命，全操在他們的手上。……政府只爲豪紳張目，看風雲氣色以定趨向；要改造社會，便不能避免直接衝突」。這是鄉村工作青年最可寶貴的實際經驗！

第四節 鄉村工作的出路

除掉鄒平定縣之外，其它各地的鄉村改良工作，雖然各有各的巧妙，可是所得到的結果也是一般無二。鄉村改良工作爲什麼不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呢？因爲第一，他們不能抵禦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俞慶棠先生根據多年鄉村工作所得經驗，曾經指出：「從事於鄉村工作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使每畝困地增加半擔以上的收穫，這是了不起的成績了。如果一旦洋米傾銷，或棉麥大量進口，每擔

農作物的價值，立刻可以跌到原有價格的半數』。過去蠶桑改良工作所得到的結果，便是最顯著的榜樣。

第二，他們不能阻止地主豪紳們的剝削農民。如在霍丁六先生任定縣縣長時代，定縣『農民同學會』把青年農民組織起來，當地的大紳士馬上出來反對，要驅逐平教會。爲了不忍拋擲平教會幾年來努力的成績，霍丁六先生祇得去職，『同學會』也祇得停止活動。這件事實告訴我們，標榜着『和平建設』的鄉村改良運動，是不能稍稍觸犯地主豪紳們的利益的。

千家駒先生在中國農村建設之路何在一文中指出：『平教會的工作，實包含着一個不能解決的矛盾。他們想不談中國社會之政治的經濟的根本問題，但是他們所要解決的却正是這些根本問題，他們不敢正視促使中國國民經濟破產和農村破產的真正原因，但是他們所要救濟的却正是由這些原因所造成的國民經濟破產和農村破產』。

同樣，鄒平的梁漱溟先生雖然看到了中國農村破產的真正原因，但仍把它輕輕撇開。他說：『外國侵略雖爲患，而所患不在外國侵略；使有秩序，則社會生活順利進行，自身有力量可以禦外也。民窮財盡雖可憂，而所憂不在民窮財盡；使有秩序，則社會生活順利進行，生息長養不難日起有功也』。

可是梁先生却沒有知道，社會『秩序』的破壞，根本只是『民窮財盡』所造成的結果；而『民窮財盡』又是『外國侵略』，和地主豪紳們的殘酷剝削所促成。『如果我們不從這些基本問題上着眼，結果豈止實驗自實驗，破產自破產；而且有一天破產的浪潮，會把實驗的一點點基礎，也打得粉碎呢』（這是千先生在前年說的）！

果然，跟着××帝國主義的侵入華北，梁先生的定縣不教實驗工作已經實行清遷；同時鄒平的梁先生也因某種政治上的原因而被迫辭職了。從這慘痛教訓中間，我們已可明白看出，在這民族危機最緊迫的時候，全國鄉村工作青年除掉一致團結，訓練全國農民起來參加民族解放和農村改造運動之外，是決不會有第二條出路的啊！

最後，爲着避免誤解起見，我們對於鄉村改良運動還要提出三點補充意見：

第一，對於鄉村改良工作的本身，例如農民教育和技術改良等，我們非但並不反對，而且認爲必要。不過假使單靠它來改造農村，復興民族，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已經失敗了。

第二，鄉村改良工作雖然不能改造農村，復興民族；但是鄉村工作青年決不應當因此消極。恰恰相反，他們應當糾正過去所犯錯誤，積極地把這些工作充實起來，使它

成爲一個民族解放和鄉村改造運動。

第三，在這民族危機最緊迫的時候，全國鄉村工作青年更應當拋棄門戶之見，一致團結，領導全國農民，起來參加民族自衛戰爭。

本章重要參考資料

1. 中國農村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李紫翔中國鄉村建設批判
2. 中國農村建設之路何在千家駒中國鄉村建設批判
3. 中國的歧路千家駒中國鄉村建設批判
4. 爲什麼要批評鄉村改良工作孫冶方中國鄉村建設批判